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温州城市化发展体制性障碍及创新研究

姓名：陈俊屹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公共管理

指导教师：王霞

20081101

摘要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城市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变迁的复杂过程。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化对区域发展起着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是通过城市的聚集功能、扩散功能和创新功能实现的。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受到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制度安排的制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量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市场化的制度安排除了能够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法制保障，还能使中心城市功能最大化，缩小地区差距，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以温州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借鉴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托区域经济理论，制度经济理论，研究了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安排在温州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化的一般机理，制度安排对中心城市的作用机制，制约中国中心城市功能的制度分析以及解决制度障碍的对策和建议。笔者首先对温州城市化的特征、功能进行分析，了解温州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影响其功能的体制性障碍因子，认为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及社会保障体制等影响了城市化的集聚、扩散功能，并立足于探讨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深入分析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性障碍，指出制度因素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创新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温州，城市化，体制障碍 创新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o modern urban society, and it's the intricate transitional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n city. A city is the cen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plays a role of le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ity center aggregation, spread and the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is affected by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more; it is restricted by institutional setting.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 the system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must not be overlooked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arket-orien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addition to clarifying ownership,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providing legal protection, It would also enable maximization of the function as a city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and to stimula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ake the Wenzhou city as an object study, and drawing on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economics, I make a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Wenzhou's economy. The study includes general mechanism, and arrang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sm arrangements affecting the urbaniz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limit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problems.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factors impacting its functions obstacles factor at this stage of Wenzhou's economic reform, I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I find out that the regimes of land syste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urban management, government's macro-management system are impacting the functions of clustering and the spread of the urbanization.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urbanizat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institutions is deep-seated reason of affecting urbanization in Wenzhou and put forward material advic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y deeply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 of urbanization in Wenzhou.

Keywords: Wenzhou, urbanization,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novation

图目录

图 1.1 论文技术路线图·····	8
图 2.1 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	13
图 2.2 劳动力迁入市场驱动城市部门发展的概念模型·····	14
图 2.3 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概念模式·····	15
图 4.1 主要年份温州城市化变动·····	30
图 4.2 1990 年-2006 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	35
图 6.1 规划决策管理体制建构示意图·····	48

表目录

表 2.1 钱纳里关于不同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正常变化的统计分析·····	16
表 2.2 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城镇化率的对比关系·····	17
表 4.1 温州市主要年份国民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比重情况·····	31
表 4.2 地区工业化划分标准及 2006 年温州指标值·····	32
表 4.2 温州市各主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基本情况 (2006 年)·····	33
表 4.3 浙江省各港口吞吐量情况·····	36
表 5.1 温州市主要年份城乡收入比情况·····	41
表 5.2 温州市 2006 年城乡收入比与省内主要城市比较·····	41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同济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下各项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学校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学位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学校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学术活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经指导教师同意，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指导教师签名：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同济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签名：

年 月 日

第1章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绕不开的发展之路，也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就是同时并进的。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未能迈过城市化门槛，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绕过城市化，走上工业化道路。19世纪初，英国只有3096人的口生活在城市中，而到了19世纪末，英国城市人口就上升到70960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的近旁，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人，如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①因此，我们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也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观念偏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为了赶英超美，尽快地实现工业化，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为手段，走高积累低消费的路子，优先发展重工业。于是，一些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便纷纷出炉。利用“户籍制度”来阻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的利益，来加速工业化进程；“三年困难”时期，搞职工下放，在文革期间，鼓励“上山下乡”来减少城市人口，压低城市消费，等等。这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非但未能使我国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反而贻误了工业，耽搁了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直到现在，中国仍然是个城市短缺的国家。到2002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39.1%，这不仅低于49%的世界平均水平，也滞后于自己工业化水平的5.3个百分点。

新世纪有“城市世纪”或“城市时代”之称^②，未来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城市化的世界。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其进程不仅表现为表面的数量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

^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0页

^②1993年联合国东京会议，称“21世纪将是一个新的城市世纪”，根据联合国预测2000年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从24亿猛增至5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从47%升至61%以上

为制度安排的变迁。笔者认为，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制度安排必然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制度安排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双向互促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将城市化发展归结为城市化的动力系统（如经济发展、工业化、科技进步、第三产业的发展等）的促进。这种观点并没有错误，但有失偏颇，因为它忽略了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即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从我国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国家对城市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安排对于城市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笔者认为，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动力的保障，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城市化动力系统发挥最大的效率，进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因此，研究加快温州城市化的进程有必要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深入的探讨。

其一，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依据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来探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对于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制度因素研究不够，尤其是对于个别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区指导性不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多。尤其是温州作为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民营经济发达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百姓领先致富而政府调控能力不足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区，对其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研究寥寥无几，这是笔者选取这一研究主题的主要出发点。

其二，就现有城市化制度的研究来看，其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探讨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对城市经济系统的影响，无论是对经济要素流动制度的研究还是对城市化的产业制度、城市建设投资制度的研究，都着眼于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城市经济系统的变迁和发展，同样也是城市社会系统的变迁和发展。因此有必要丰富和完善目前的成果，系统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这是笔者选取这一主题的另一考虑。

其三，就目前城市化制度安排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倾向于将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为城市化的直接动力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促进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并没有阐明如何作用于城市化的进程。笔者认为，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动力系统的保障，它并不直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是通过提高城市化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来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安排推动城市化必须借助诸如工业化、经济发展等中间变量来实现。

其四，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以上海为中心，沪、苏、浙为主体，这一地带在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

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成为了热点。而关于浙江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杭州、宁波等杭嘉湖地区，对浙南地区却涉及不多，主要和该地区处于长三角边缘有关。随着浙江省的发展点由杭嘉湖向温台沿海地区的逐步扩展、沿海大通道建立后长三角沿海辐射能力的增强、台海局势缓和促进两岸经济的进一步互动交流，温台沿海地区发展将开始加速，尤其是温州作为浙南闽北这一广阔地域的最大城市，对于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研究变得十分必要。

最后，笔者选取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是基于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进行制度研究也有助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的考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现代化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目标。城市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同时，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城市化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资源问题等等，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制度创新。

1.2 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城市化作为世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但是，早期国内的城市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城市化的规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的模式等基本理论，较少研究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因素。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步认识到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重要关系，不少学者提出，制度安排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并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作了一系列的研究。

实际上，从产权和制度改革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在国内外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程，英国学者柯克比(R. J. Kirkby)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制度安排对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滞后主要是由于倾向于工业化建设的政策安排所致。中国为了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忽视了城市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生产，大量的资金用于重工业的建设，削弱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后劲^①。美国华裔学者陈金永也认为，中国城市化不足可以用社会主义工业偏爱的发展逻辑来解释，这与柯克比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相似。香港学者薛凤旋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受

^① 王放. 我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科学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第19页

其社会经济体系的影响深刻。大陆学者在近几年的城市化研究中，也基本上达成了制度安排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重要影响的共识。国内学者张五常先生在这方面颇有建树^①，从制度角度来研究国内城市问题自上个世纪末也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樊纲在《关于在要素流动中缩小“人均收入”差距的思考》一文中就提到了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2000年樊纲、王小鲁在《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提出了市场化指数的概念，陆续为定量地考虑制度因素的经济意义提供了重要依据^②。近年国内学者将制度安排纳入城市发展研究，苗建军从制度角度对中心城市发展展开了规范性研究，对比改革前后的制度安排与政府行为，用绩效说明了有效制度安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从财政政策，金融体制，产业政策等角度研究城市问题及区域调控也大量存在^③。魏敏、李国平从梯度转移角度研究影响东西地区差异的因素，对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有借鉴意义^④。刘传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结构变迁联系起来，从制度安排及变迁的角度解释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来展望相关的制度创新。他重点探讨了农地制度、经济要素流动制度、民营工商业制度以及城市建设投资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措施（刘传江，1999）。叶裕民从我国城市化的制度支持系统出发，指出了城市化过程中经济支持系统和制度支持系统的重要作用，对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制度的演变轨迹及其对城市化的正反面影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构建了一个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框架，并且进一步对每一项具体制度的创新内容、实施步骤以及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作了详尽的论述，将我国城市化的制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裕民，2002）。吴力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他将制度理解为具体的可以表述的“正式规范”，以一个具体的可描述制度作为某一类制度的代表，描述该制度与城市化的关系；他以企业产权制度代表对分配的约束，以户籍制度代表对身份的约束，以就业制度代表对劳动的约束，以财政制度代表对社会管理的约束对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城市化进程进行了测量，开创了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定量分析的先河（吴力子，2002）。汤海孺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出发，主

^① 张五常. 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②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经济研究, 2003年

^③ 苗建军. 城市发展路径——中心城市发展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

^④ 魏敏, 李国平. 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梯度转移. 经济地理, 2005年

要分析了城市要素的空间聚集，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框架。他认为，城市规划的实施与其背后的体制关系紧密，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规划结果，因此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汤海孺，2000）。邹农俭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市镇设置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并非是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达到城市数量的增加，而应该实现两个转变：即由农村人口为主向城镇人口为主的转变；城镇体系由不合理到比较合理、有序的转变（邹农俭，1998）。陈东其分析了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二元结构，指出二元结构转换滞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并且提出了在提高农业和土地生产率的前提下，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和相关人口为切入点，实施“有效减少农民”的战略，从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陈东其，2002）。此外，还有人城市化的制度伦理支持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将伦理道德规范上升到制度的层面，通过制度约束的形式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内化制度规范而树立正确的社会公德意识，以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为我国的城市化提供良好的伦理环境（费尚军，2002）。总的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学、社会学、规划学等角度对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建设投资制度、市镇设置制度、教育制度、城市行政管理制度、伦理制度等方面。综上所述，各学说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预见，在21世纪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于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研究将会进一步的深入。

1.3 研究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作为经济结构现代化另一重要表现的城市化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严重滞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水平的低下，而在于制约、影响城市化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所以，研究温州的城市化进程，不能局限于表面数量的增长，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即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本文以温州市为对象，针对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综合性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出发，了解城市化与制度安排的现状，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适应城市化加速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做到合理、健康地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全面发展。并且希望通过对温州市的研究，探索中等城市在制度安排保证下如何保持自身

特色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从而对相似类型城市的发展有所启迪。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立足于对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既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也研究城市化的发展对制度安排的促进；既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经济系统的影响，也研究制度安排对城市社会系统的影响，通过理论的探讨对温州城市化的制度创新提出具体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运用文献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温州城市化的制度创新进行探讨。总体来看，社会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以及历史分析法是本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本研究贯穿始终的研究方法。具体来看，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根据研究的需要，局部采用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文献法，比较法，归纳与演绎，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等。此外，本文的研究中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了社会学、制度经济学、人口学、行政管理学、社会保障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技術路线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探讨制度安排对温州城市化的影响，并为温州城市化的制度创新提供具体的建议。全文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章系统而扼要的概述了当前国内有关城市化的制度安排的研究现状，指出了国内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即在相关制度安排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探讨制度安排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侧重于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分析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关系，而有关制度安排对城市社会系统的影响论述不足。同时指出，已有研究对制度安排如何作用于城市化进程的机制探讨不够深入。此外，本章还阐明了笔者的研究视角和主要方法。

第二章主要介绍相关城市化理论，对城市化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了详尽地阐述。城市化是动态的演化过程，城市化理论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更新完善的过程。基于城市化的渊源、概念界定以及以人口转移和集中为前提、以经济活动的集聚为主要内容、以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为核心、以农村和城市的互动为基本方式的本质特征分析，本章充分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

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和生态学派理论。同时针对城市化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阐述了相关城市化驱动机制。研究城市化发展问题，有必要深入系统地把握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理论和城市化经济驱动机制，对这些理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城市化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也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制度安排与城市化关系。笔者认为，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并不直接作为城市化的动力因素，而是通过提高城市化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相关制度的变迁和完善。

第四章主要对温州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回顾，并对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了历史和现实的考察。笔者认为，温州城市化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依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部分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五章对温州城市化制度安排的特征作了详细的描述，并且指出当前影响温州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障碍为城市发展政策、行政区划、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等。

第六章从微观角度对影响温州城市化进程的几种主要制度提出了创新的具体建议。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创新、行政区划、户籍制度创新、土地制度创新、城市建设投融资制度创新等。具体内容将在第六部分作详细讨论。

第七章主要对全文的重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就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反思。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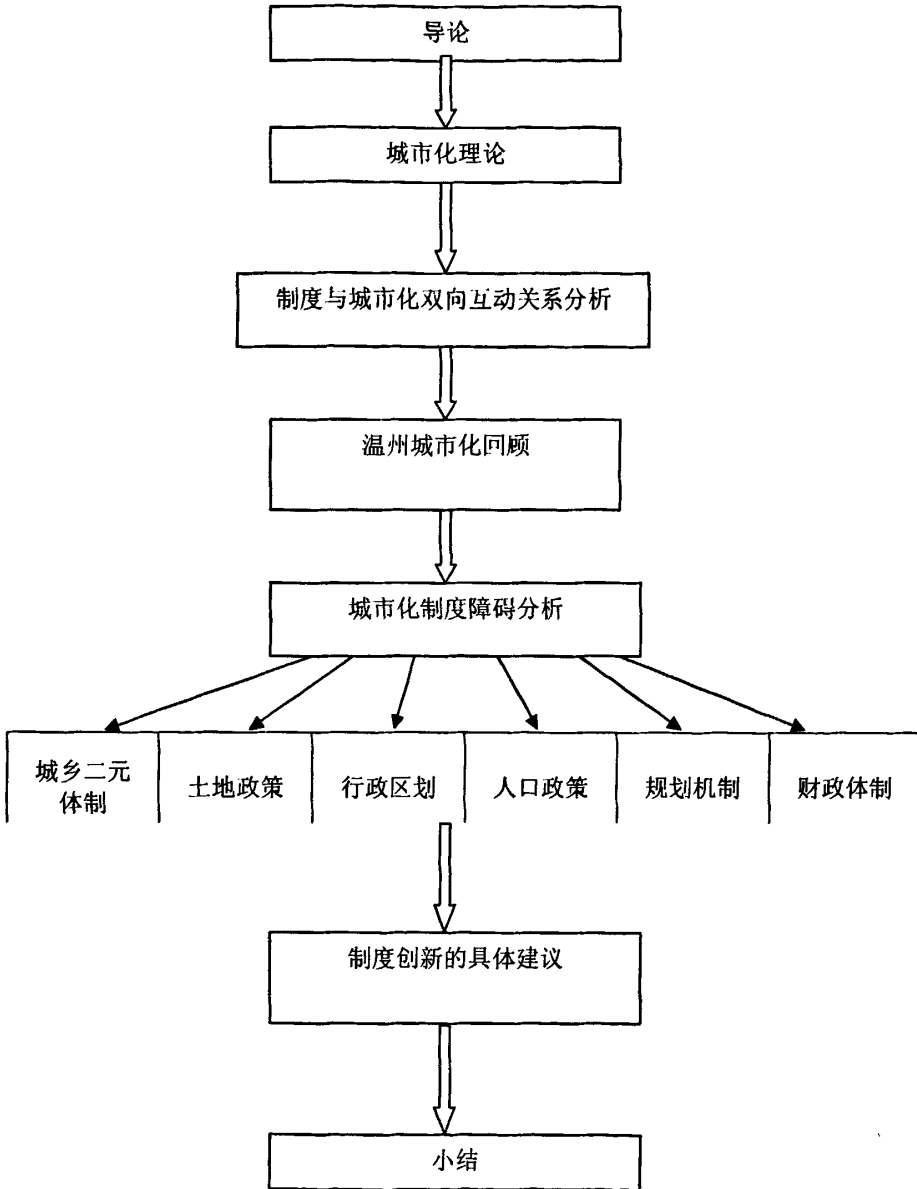


图 1.1 论文技术路线

第2章 城市化发展相关理论

2.1 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2.1.1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最早源自于农业区位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杜能在《孤立国》中对农业土地效益进行了研究（杜能，1826），这被视为最早的区位研究。系统的区位理论是由近代区位理论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韦伯完成的，他在1909年出版的研究工业区位问题的著作《区位的纯粹理论》是第一部分关于工业区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著作，标志着区位理论的诞生。克里斯塔勒的《南部德国德中心地》和廖什德《经济空间秩序》等著作，在总结农业区位理论和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增添了市场分析、贸易分析等区位分析方法，将区位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区位理论认为，运费、劳动力费用和聚集经济是最主要的区位因素。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点状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由不同的城镇个体及子系统组成，城镇之间及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城市的集聚性使得作用力最大，从而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也就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区位理论的贡献在于分析了城市效益的根源，确定了城市的分布状态和分布形式。

2.1.2 结构理论

城乡经济、人口变动是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三种模式讨论了城乡结构的变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是在刘易斯“二元结构”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上建立的发展中国家两部经济发展模型。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的各种假设作了深刻反思，进一步深化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研究，指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托达罗模型指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条件取决于城市和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异和城市为农业人口提供的就业机会。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现代部门才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通过现代部门不断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可以改变人们的就业、居住方式和消费结

构来实现城市化。由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类型—农村工业经济的存在，中国理论界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构筑了三元经济结构模型，也被称为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旧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逐步转向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双重二元结构，即位于农村地域上的农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以及位于城市地域上的城市传统工业区和城市新兴经济区，由此也就构成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日趋复杂的二元矛盾。另一种结构理论是三元区域结构理论，将社会区域划分为农村、小城镇和城市，突出了小城镇在社会区域地位中的不断上升；或将社会区域划分为城、郊、乡，认为城市的发展具有膨胀力将会不断地包容城市的周边地区，形成混杂城市和农村两种因素的“社会性接触变质”地区，或称“DESAKOTA”区域(城乡融合区)。

2.1.3 区域分工理论

区域分工理论的主要源自：一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二为赫克歇尔(E.Heckscher)和俄林(B.C.ohlin)的要素禀赋学说。李嘉图的比较利益(比较成本)从生产上的相对优势和成本上的相对差别出发，主张劳动地域分工等；赫克歇尔的基本思想是区域之间或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是它们之间出现分工和发生贸易的主要原因，后者是基于前者的研究，均强调区际分工和区域优势发挥的重要性。

本文所谓区域分工是指经济分工，即所研究的经济区域之间的生产性分工，是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通常总是由若干个异质经济结构的更低层次区域整合而成，而不可能由若干个同质经济结构的更低层次区域集合而成。在资源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为满足各自区域经济方面的多种需要，提高经济效益，各个区域在经济交往中必须要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于是，在区域之间就产生了分工。区域分工实质上表现的是所研究的经济区域之间的分异和依存关系。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区域经济专门化的发育程度，决定着区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决定着各经济区域的经济优势，决定着区域经济联系的内容、性质和规模等。所以，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区域发展的本质。

2.1.4 极化理论与城乡互动理论

极化理论主要是对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及其转变趋势进行探讨，认为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将扩大区域差别，并从空间角度给予解释。佩鲁（F.Perroux）提出“增长极化及其效应原理”，这是极化理论的开端（佩鲁，1950）。缪尔达尔（G.Myrdal）研究了其中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缪尔达尔，1957）。赫希曼（A.D.Hirschma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这是极化理论的发展。极化理论片面强调了地区的累积性优势，而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对城市和乡村发展的作用，认为城乡差距有不断扩大的差距。

而城乡互动理论认为城市和农村是区域整体的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城市在空间地域上的前进与农村在空间地域上的后退是同样明显的。也即，农村城市化使农村由静态变为动态，从而置城乡于一个互动的系统中，构成一个动态的连续体，即由城市、城市边缘区、小城镇和乡村组成的一个变化着的混合体。因此，当代意义的城市应该包括城市、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城市这三部分，而当代意义的农村也应该包括乡村、乡村城市和城市边缘区三大部分。在互动过程中，城乡得以共同提高。

2.1.5 集聚—扩散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必然首先在一定的地点（即经济增长点或增长极）发生，然后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增长的实现必须具备生产要素，无论是劳动力、资金还是技术都会自发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各种要素都有一种自发的流动趋势，即从低效益的地区、部门流向高效益的地区、部门，力求实现资源的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城市就具备对要素的吸纳和聚集功能，城市的市场容量大、规模效益高、交易成本低、专业化分工细密、信息传递快速、外在效益明显、基础设施于服务水平优良、竞争环境规范、消费者选择的广阔，这些都是城市具备的聚集效应的优势。但是，当城市的聚集效应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由于经济增长点的高速发展会受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约束，发展速度可能放慢，诸要素开始寻求更为有利的发展机会，于是出现了由增长点向周围地区的扩散效应或辐射作用，带动了城市周边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2.1.6 反磁力理论(卫星城理论)

该理论的先驱是 E.霍德华(Ebenezer Howard)，他在 1898 年写了本题为《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的书,此书在修改后于 1902 年出版时更名为《明天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E.霍德华主张在城市的远郊建设一些地理上独立的小镇,镇上有工业、商业和其他工作岗位,居民可以就地工作和居住生活,这样将大城市多余的人口疏散到这些小镇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和负担。这些在城市外围建立的若干小城镇就是“反磁力中心”,它们在分散中心城市压力的同时也将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传输到周围腹地,深化了城市化的进程。爱伯克隆比(P.Albercrombie)在大伦敦规划中实践了 E·霍德华的“田园城市”构想,这是反磁力理论的首次运用。美国格拉姆·罗迈·泰勒在 1915 年将这些建立在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定义为“卫星城”(Satellite City),认为它们类似于宇宙中的卫星,可以分解大城市在地域、人口、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压力。英国率先建立了卫星城,之后法国、日本、意大利、苏联、美国、比利时、荷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卫星城,我国京津沪等大城市的郊区也建立了卫星城。第一代的卫星城即卧城,是只提供生活设施不提供工作娱乐环境的小型居民城镇,第二代卫星城增加了居民的工作和文化设施,第三代卫星城基本上独立于中心城市,第四代卫星城已经形成了与中心城市互相影响的网络式格局。反磁力理论(卫星城理论)的提出旨在削弱从边缘区到核心区的回波效应,有助于最终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

2.2 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机制

由于城市能够产生外部性经济,城市化不仅决定于经济增长水平,而且也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发展经济学家(Perroux, 1955; 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和地理学家(Pred, 1966)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就指出,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人们对这种作用的机制并不清楚。90 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 日本经济学家 Masahisa Fujita 以及英国经济学家 Anthony J.Venables 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交易技术为基础,对人口和经济集聚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几种理论模式。其中最主

要的模式是迁移驱动模型(krugman, 1991; Puga, 1998)和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Venables, 1996)。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外部性经济，一是需求和成本的联动效应；二是劳动力市场效应；三是信息外溢效应。对于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几种模式来阐释这一问题。

2.2.1 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Anthony J.Ven-ables 在其“垂直联系产业的均衡区位”(1996)一文中提出投入-产出联系驱动累积性经济集聚的模型。与要素迁移驱动经济集聚的模型不同，投入-产出联动模型强调企业间投入-产出的联动作用。这一理论中关于企业迁入的投入-产出成本和需求联动思想可以借鉴到企业从农村迁入城市而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的过程上来。如图 2.1 所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乡镇企业迁入一方面扩大了上游产品的当地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生产下游产品的企业获取这一投入的运费，这两种力量将导致城市生产效率提高，地方盈利能力和积累能力增强，从而带来新的企业形成，而这又会导致新一轮的联动。因此，乡镇企业迁入城市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在这里，劳动力供给弹性是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重要条件。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没有弹性的，新企业迁入将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价格上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城市盈利能力，从而使集聚和增长难以维系。在城市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要素供给弹性只能通过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以及区际劳动力流动来保障。因此，劳动力流动是投入-产出联系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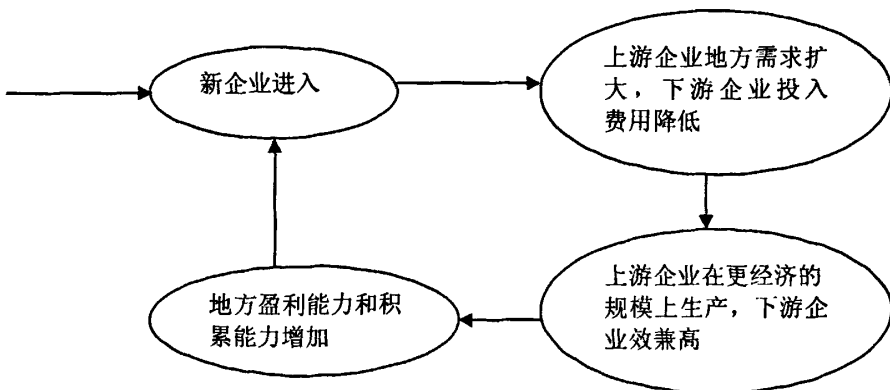


图 2.1 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

2.2.2 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和迁移驱动模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Krugman 教授在其著名的“递增报酬与经济地理”一文中首先提出劳动力迁移的需求联动的地理集聚模型 (Krugman, 1991)。在 Krugman 模型中, 不存在区域内部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劳动力迁移, 只有城市部门内部的区别劳动力迁移, 这显然不符合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考虑到这一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Puga 教授在其“城市化格局: 欧洲对欠发达国家”一文中提出了既包含区际劳动力迁移又包含区内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的地理集聚模型, 进一步发展了 Krugman 模型 (Puga, 1998)。Krugman-Puga 模型描述和解释的是在一定工业化水平下经济的地理集聚, 而非地理集聚对工业和经济增长的驱动, 但是其关于劳动迁移的需求联动思想可以借鉴到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而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的过程上来。如图 2.2 所示, 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 设想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城市地域。劳动迁入将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和地方支出, 因而抑制城市工资上升、增加生产规模报酬, 进而提高城市生产率, 增强城市盈利能力。这将导致城市积累能力提高和新的资本形成, 新资本形成吸引劳动力迁入, 而劳动力迁入又将增加城市地方支出。因此, 从城市部门来看, 劳动力从乡村迁入城市将通过需求联系驱动经济累积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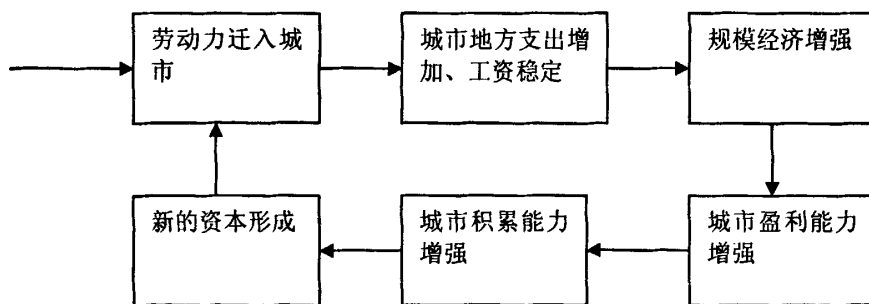


图 2.2 劳动力迁入市场驱动城市部门发展的概念模型

2.2.3 区域贸易一体化

城市不仅是为本地服务的, 更重要的是为其他城市和区域服务, 因此由区域

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区际交易效率必然影响城市化。在区域贸易成本很高时，企业集中的效率会受到较大限制。如图 2-3 所示，当区域贸易一体化不断加深，区域贸易成本持续下降、区际交易效率提高时，城市输出产品利润率提高，从而引起新企业形成。新企业经由投入——产出的成本和需求联系以及劳动力迁移的需求联系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因此，区际贸易一体化有利于城市化，并通过城市化驱动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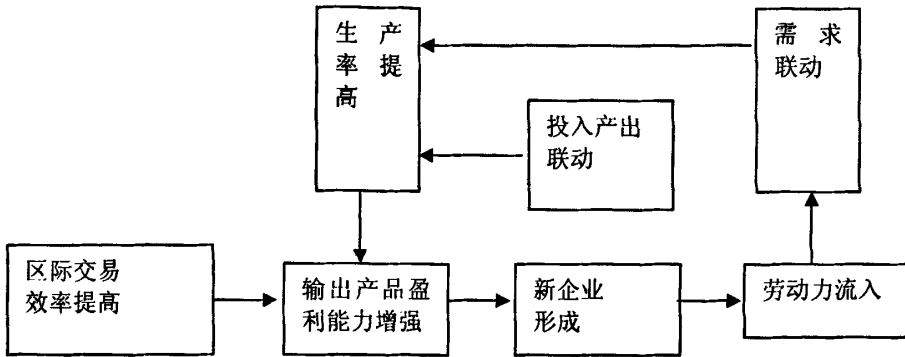


图 2.3 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概念模式

2.3 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测度方法

2.3.1 钱纳里标准法

对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测度的一种方法是广泛应用的钱纳里标准。钱纳里标准是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根据 100 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经济结构变化统计经验值。如下表：

表 2.1 钱纳里关于不同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正常变化的统计分析

人均 GNP (美元)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非农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	工业就业比 重(%)	非农业就 业比重(%)	城镇化率 (%)
100 以下	17.8	49.2	7.8	30.2	12.8
100	21.0	56.4	9.1	35.8	22.0
200	28.7	69.5	16.4	46.5	36.2
300	33.0	75.9	20.6	53.6	43.9
400	36.1	80.0	23.5	59.0	49.0
500	38.3	82.7	25.8	63.4	52.7
800	42.9	87.7	30.3	73.3	60.1
1000	44.9	89.6	32.5	78.2	63.4
1000 以上	48.8	91.0	36.8	87.8	65.8

资料来源：冯邦彦、马星，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2005.4

2.3.2 IU、NU 比的 0.5 和 1.2 国际标准值法

在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时，经常涉及到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等概念或指标。其中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可从工业劳动力或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工业增加值或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两方面来考察，城镇化率一般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具体分析时，人们通常用 IU 比和 NU 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 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即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与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比值，NU 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即非农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如果 IU 比等于 1，表明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等；如果 IU 比小于 1，表明了业化率低于城镇化率，城镇里存在着第一、三产业的劳动力；如果 IU 比大于 1，表明了业化率高于城镇化率，农村中存在着第二产业的劳动力。NU 比如果小于 1，表明城镇里存在着一定的农业人口；如果 NU 比大于 1，表明农村中存在着一定的非农业劳动力。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 比大致为 0.5，NU 比大致为 1.2 左右。如果 IU 比明显小于 0.5，而 NU 比明显小于 1.2，则说明不仅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城镇地区，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人口也集中在城镇地区。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是超前发展了，会出现过度城镇化的态势。其表现是大量农

村人口涌入城镇地区，而城镇地区又无充足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过度膨胀的城镇会出现大量贫民窟等一系列城市病。相反，如果IU比明显大于0.5，而NU比明显大于1.2，则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的发展是滞后了，表明城镇化发展不足。

表 2.2 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城镇化率的对比关系

		I	N	U	IU	NU
发达国家	1950年	30.45	62.20	53.80	0.57	1.16
	1960年	34.65	71.75	60.50	0.57	1.19
	1970年	37.55	81.95	66.60	0.56	1.23
	1980年	36.70	83.75	70.20	0.52	1.19
发展中 国家	1950年	7.35	19.25	17.00	0.43	1.13
	1960年	9.55	24.35	22.20	0.43	1.10
	1970年	12.20	29.30	25.40	0.48	1.15
	1980年	14.95	34.65	29.20	0.51	1.19

注：

I——工业化率(%)，N——非农化率(%)， $IU=I/U$ ， $NU=N/U$ 。

资料来源：冯邦彦、马星，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城市经济、区域经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2005.4

IU、NU比的0.5和1.2国际标准值法是根据上述提到的IU、NU比的0.5和1.2国际标准值来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是滞后、超前于工业化，还是与工业化相协调。例如，表2.2反映了1950年至1980年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率、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对比关系。

从表2.2可以看出，从1950—1980年期间，世界上工业化率、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之间基本上成正相关关系，而且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基本上是协调的。其中发达国家的IU比为0.5多一点，NU比为1.2左右；发展中国家的IU比为0.5少一点，NU比为1.2少一点。特别是从纵向的角度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发展，IU比越来越接近0.5(其中，发达国家由1950年的0.57变为1980年的0.52，发展中国家由1950年的0.43变为1980年的0.51)，NU比越来越接近1.2(其中，发达国家由1950年的1.16变为1980年的1.19，发展中国家由1950年的1.13也变为1980年的1.19)。

2.4 制度因素与城市化

从制度经济学看，城市的产生有两个要素：一是交易规则，一是交易成本。如果既定区域没有出现垄断势力，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和生产的专业化也不断提高，交换的发展使得交易规则不断完善，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使得资源集中开始出现。于是，城市开始产生。如果既定区域有垄断势力，那么，为维持这种垄断势力和降低垄断成本，维持垄断的资源也就需要不断地集中，最后，城市也就开始产生和发展。

追求（潜在）利润是工业化扩张和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早期的城市化来源于纺织业的发展。由于纺织业比种植业能更快地得到农业剩余，以纺织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得到不断发展。进而带动了其他初级工业的发展。农村家庭的传统生产被纳入工业体系，农民变成了工人，而商人和工业集镇不断增加，工业化就这样引发了城市化。

世界工业化的发展经历了从“要素推动”到“创新推动”的两大历程，使得资源的集中程度和整合速度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资源交换条件得到了极大的完善。这个过程也就是社会文化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这个过程表现为先进的、多元的城市文化将逐渐取代落后的、单一的农村文化，以及民主的、正式的城市社会制度将逐渐取代非民主的、非正式的农村社会制度。

以罗纳德·H·科思（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中国建国以来城镇化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践证明，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这种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农业产品剩余和要素剩余。二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三是通过有效

率地促进经济要素流动的的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部门的要素流入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四是通过有效率地推进城镇建设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城镇基础设施及房地产业的开发，从而满足了城镇非农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的需要。

城市化加速是20世纪的许多奇迹之一。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国家，都体现了高度的城市化，而几乎所有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化远未成功。这足以说明市场经济制度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制度基础，换言之，市场机制是促进乡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加速集中的基础性机制。作出这种判断的理论依据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内容是人口和资源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和迁移，不存在任何的人身依附、土地依附或政治依附关系。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表明，人身依附关系越显著，越阻碍人口和经济的流动，同时也就越阻碍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创造了人口和经济自由流动的的制度前提，并通过利益机制促进资源包括乡村人口向具有规模效益、聚集效益的城市区域流动。

第3章 城市化的制度视角

3.1 城市化制度与制度创新

3.1.1 城市化

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研究城市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转化；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后果；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笔者认为，城市化实质上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多变的系统转化过程，包括城市经济和社会两大系统的更替和提升，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迁的过程。本文中所指的城市化的过程是指城市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条件下突出环境友好，强调社会发展，注重效率是衡量城市化最主要的标准。温州城市化发展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城市的发展必须贯彻“城以人为本，民以城为家”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城市化，城市的发展是计划的产物，城市的重心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处于次要地位。因此，许多城市至今仍有大量的历史欠账须解决。在温州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注重人与自然和谐。

二是城市的等级结构是依托中心城市的城市群优先发展。传统的城市化是

限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力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成为大战略，农民的转移是就近转移，“离土不离乡”。现代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城市规模大，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就强，并能有效的催生城市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大城市战略本身就是一条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途径。从国外实践来看，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总趋势和一般规律，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时，往往选择大城市战略。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目前全球区域城市共生化趋势的表现，成为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把握城市“集群”发展的趋势，科学规划、积极引导，努力形成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

三是城市的功能分区贯彻方便市民，功能优先的原则。传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功能分区十分清晰，以规划师的指挥棒为转移，城市功能区间的人流、物流造成人为拥堵局面。完善城市功能是城市空间布局产生的原始动力，也是城市规划、城市经营中必须牢固树立的首要理念。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发展中因为盲目的功能分区而人为的增加城市运行成本，降低运行效率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温州城市化必须要求在城市空间布局设计中要贯彻紧凑社区、就近就业、较低的开发成本和环境成本、尊重自然生态、混合土地使用等原则，居住地与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应尽可能接近，避免再出现工作与居住明显分区的现象。

四是城市管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传统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管理是以方便管理为主要原则，城市建设方方面面的设计，均要体现便于政府管理，便民与效率则在其次。而从城市化进一步发展要求来看城市的交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住房、城管等既要注重人居环境、体现公平，又要兼顾效率的提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五是城市的扩张发展与产业集群的生态互动。传统的城市化十分重视工业的发展，但这种工业的发展是计划的结果，缺乏系统理念，缺乏有效的集中，缺乏规模化和专业化，工厂与工厂之间布局互不相干，工业发展的整体效率较低。当前温州城市化强调的应是城市的快速扩张与产业集群发育的生态互动。如果把工业化和城市化比作走向现代化动力车组的两个火车头的话，产业集群和城市群就是火车头上的发动机，它已成为区域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一方面，产业集群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城市交通、宾馆、展览、商业等第三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集群及相关产业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城市人口比重上升, 社会总产出中城市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 区域城市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 城市化的加快进一步促进资源的集聚, 催生相关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两种乘数的交互作用, 使城市集聚经济得以实现,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3.1.2 制度

制度的内涵多种多样, 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 使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研究制度却是从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的。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研究制度变迁及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 把制度作为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

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诺斯指出, 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 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①。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 这里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他对制度作了经典性的分类:

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 如货币、期货市场等。

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 如合约、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安全计划等。

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 如财产、包括遗产法, 自立和劳动者的其他权利等。

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 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等。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行为规则, 这种规则至少在特定社会范围内是统一的, 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或激励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可以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②③}。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例如法律和产权规则、规范和社会传统等。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环境层次上的制度。制度环境相对稳定, 一般不发生变化, 但这不是说不能变化, 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逐渐变化的。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 它支配经济

^① [美] 科斯·诺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② [日]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 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01

^③ [美] w·阿瑟·刘易斯, 梁小明译. 经济增长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单位之间可能采取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制度安排可能是最接近“制度”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或者说，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制度安排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它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

制度安排至少有两大目标，一是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二是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作竞争的方式。制度安排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也有人把制度定义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

3.1.3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给制度创新下的定义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笔者认为，制度创新是指对现存制度的变革，它的实质是一个社会以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竞争规则、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各种主要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提高现有制度系统的运作效率，制度运作效率的高低是衡量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志。

3.1.4 工业化与城市化

所谓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日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持续扩张，特别是制造业增长迅速，导致农业部门净产值和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而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大体上保持不变，结果，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渐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经济就实现了工业化。

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的定义，城市化是“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转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农民在工作存在利益差别的前提下，不断从农业劳动转为从事工业、商业及其他非农业劳动。在参加这些劳动的过程中，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日益接近。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近代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18世纪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加强，加强了地域分工，促使了工业和人口在地域上的集中。工业化的发展扩大了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本身基础设施的完善

和城市化的“拉力”，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化的“推力”。但工业化能否顺利地推进城市化，还要取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能否形成相互关联的内在机制，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

3.2 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

3.2.1 制度安排的一般功能

制度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林毅夫认为，制度提供了安全（对确定性）与经济（规模经济与外部效果内部化）两方面的功能服务。张春霖认为制度提供了资源配置功能和行为动力功能；刘世锦则将制度的功能分为激励、配置、保险和约束四个方面的功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激励和约束，通过激励机制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制度的功能与之存在某些共性，但是也有其特殊性，城市化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选择与确认。不管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城市化的制度安排首先都是对多样的城市存在（包括城市形态、功能、结构、文化、精神及城市人员的行为、意识等）的选择与确认。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方向，是对城市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以及生活方式变革等内容进行的选择，并以权力文本或习惯、习俗的方式对这种选择结果给予认可、明确，使城市特点成为一种在实际交往中可以感知到的明确的现实公共存在。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为人们认识城市和发展城市提供了根本途径。

2、规范与整合。城市化的制度安排的发展程度表征着一个城市的组织化、秩序化程度。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将无数的独立个人，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多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整合为一个有序的城市。没有城市化制度安排的规范、整合，也就没有城市化的稳定、秩序、一体化，没有城市的存在与发展。完善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推动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3、约束与激励。规范功能使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成为一种约束机制。城市化制度安排的整体化、秩序化导向，必然对城市成员的多样行为、多样意识等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城市化的正式制度通过监督、处罚、惩罚等形式对城市化的主体进行约束，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舆论、伦理道德等形式对城市化的主体进行有形或无形的约束。同时，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也具有一般制度的激励功能，

是一种激励机制。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以奖励、接纳等有形或无形方式，对符合城市化制度规范要求的行为进行鼓励，对城市化主体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导向、拉动作用。

4、塑形与示范。城市化过程不仅体现为城市人口的聚集，城市地域空间的转换以及城市产业的转型，同时也体现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没有有效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也就没有良好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指导。合理、良好的城市内容通过城市制度来确认，不合理的城市化内容依靠城市化制度重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以制度为核心、动力的持续过程。

①

3.2.2 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城市化发展的运行条件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运行条件：

1、微观聚散主体具有充分、完备性。要维系城市聚散机制的良性运转，必须要有充分、完备的微观主体。因为城市经济聚散力要通过微观主体的活动作用于资源配置过程。这种充分完备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微观主体是否具有充分的经济理性，即是否具有充分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包括独立的产权及独立行使产权的能力。其行为是否具有“经济人”行为特征，是否表现为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只有完备的微观市场主体才能感应优势区位上的利益激励力量，并在这一力量的驱使下做出灵敏的反应。

2、要素市场体系具有统一、完善性。要素市场体系是各种经济要素聚散配置的传导者，没有要素市场，就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最佳区位进行选择配置。这种统一、完善性表现为市场结构的完整性、多层次性和联系的有机性。市场结构不完整，会直接制约城市聚散力的传递，而且要素市场作为有形市场，其吸引力和辐射力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有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进行层层传递，才能尽量扩大要素市场的作用范围。同时，只有形成一个一体化、高度组织化的市场有机整体，各生产要素才能通过具有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进行聚集扩散。

3、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发达、优良胜。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聚散均衡机制运行的物质载体，决定了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资源要素吞吐的深度和广度。从一定程度上说，城市经济聚散过程就是经济组织与基础设施在某一空间范围结合的过程。

① 陈忠.城市制度:城市发展的核心构架.城市问题, 2003年第4期

4、聚散障碍要降到最低程度。聚散障碍包括制度、功能、运行障碍，如户籍制度、地方封锁、“诸侯经济”等，如果这些障碍存在，就会使进入成本较高，挫伤资源要素向优势区位转移的积极性。如果障碍过高，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制约并扭曲城市聚散力的市场运作，使城市聚散力难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发挥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政府应尽量减少资源、要素“进出”城市的“摩擦力”，最大限度降低门槛，保证经济聚散均衡机制充分运行，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

事实上，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下，制度供给一方面影响着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及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比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而所谓制度障碍指阻碍资源、要素流动和向最佳区位聚集扩散，促使城市经济聚散失去均衡，影响和滞缓城市化进程的各种功能、制度及运行性障碍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劳动力、资金、信息、技术及其它资源要素等不能均衡合理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以至于出现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和严重短缺的两难困境，诱发各种城市病和城市综合症，进而出现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3.2.3 制度安排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途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发明、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是经济增长本身，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国内学者继承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倾向于将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为城市化的直接动力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促进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并没有阐明制度安排如何作用于城市化的进程。笔者认为，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

1、通过提高制度系统（制度结构）的运作效率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知道，制度安排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安排很多，单一的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并不必然是显著的，单一有效的制度安排也不一定必然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只有一个社会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总和——制度结构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如果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创新，即使发生了结构转换和要素流动的动力，并不必然导致城市化或城市的正常发展。（刘传江，1999）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具有效

率,也有可能缺乏效率。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某一项制度安排是否具有效率,而是每一项制度安排共同“嵌在”制度结构中,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不必然要求每一项制度安排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提高制度结构的运作效率才能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2、通过提高城市化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很多学者将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作为城市化的动力之一来进行研究,将之与工业化、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城市化的动力因素视为同一等级的变量,认为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是城市化动力的保障,它并不直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是通过制度的保障,提高城市化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使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挥最大的作用,进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制度安排推动城市化必须借助于诸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中间变量来实现。

3.2.4 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

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是通过对各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影响实现的。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刚性。制度一经形成,该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正面的或负面的)都是强制的和持久的;如果一个国家正处于制度的变革之中,那么制度变革本身就会作为一种最为重要和最为强烈的要素,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①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中占有核心地位,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②:

1、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部门在维持本部门再生产的同时产生农业产品剩余和劳动力剩余,为非农产业和城市化发展提供推力;

2、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工业、非农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非农化,从而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必要的拉力;

3、通过有效率的要素流动的的制度安排,促进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出推力和非农业部门的要素流入拉力形成结合与集聚的合力;

^① 叶裕民.我国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② 熊利萍.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创新.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1期

4、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城市建设的制度安排，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开发，以满足城市非农产业和人口集聚对城市公共品供应和不断增长的需求；

5、通过有效率的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制度安排，促进城市文明的提升和普及，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的渗透，为城市化的进程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支持。

3.3 城市化对制度安排的反向促进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制度安排对城市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是一种双向互促的关系，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会促进城市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将推动制度安排的变迁和创新。关于制度创新的动力探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帕森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指出，制度创新的原动力来源于系统内部“均衡的失调”，这种失调引起系统内部的某种不稳定并最终导致系统体制的变革。制度学派则用“需求—供给”的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认为制度创新是否发生取决于创新者对创新的预期受益和成本的理性计算。以上这些有关制度创新原动力的探讨有助于我们阐明城市化的发展是如何促进制度安排的变迁与创新的。从各学派对制度创新的动力分析中，笔者总结出城市化对制度安排的反向促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3.3.1 城市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是制度创新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即制度的变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原有的制度安排不能满足城市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必然要求对原有城市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变革，这是推动城市化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

3.3.2 城市化的发展为其制度变迁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心理环境

社会心理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必要前提，社会心理环境的有序性和适应性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①，随着城市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化所带

^① 汪和建主编.现代经济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第442页

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步为人们所肯定，城市化的示范效应逐步发挥。人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进取性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来实现自己经济的、社会的期望，人们对制度的需求意识增强。那么这种总体上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有利于城市化的制度创新的发生。

第4章 温州城市化发展回顾及主要经验

几年来，温州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布局合理、环境优美、辐射功能强劲的现代化大都市为目标，确定以“中心集聚、两翼发展、突出重点”为城市化发展战略，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中心城市，积极推进中等城市和重点小城镇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加快城市化进程纲要》和《城镇体系规划大纲》，按照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东移、跨江、面海”的城市发展方向，拓宽了城市发展空间，拉大了城市架势，明确了以洞头半岛工程为启动建设的瓯江口区域空间拓展和以南北为轴线的沿海产业带发展，逐步实施城市中心转移和功能外拓；加快诸永、沿海高速公路和绕城高速公路的建设，使温州对外交通高速路网骨架基本形成，对外交通有了进一步改善，完善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形成合理的城市交通路网；加快城市环境建设，加强三垟湿地与大罗山生态保护工作，推进温瑞塘河综合整治，加强城市环境建设与整治，逐步改善城市面貌。加快了城市公园、广场、居民区的绿化建设，不断扩大城市公用绿化空间，城市绿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重要街区的整理，逐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加快中心城区的产业“退二进三”进程，实施城市布局合理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

一是城市建成区面积进一步拓展，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使城市建成区范围从1998年的68平方公里扩大到2007年的164.1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8.21%提高到61.49%，如图4.1。

二是城镇对人口集聚力进一步增强，城镇人口比重稳居高位。据省统计局5%人口抽样调查推算结果显示：2007年底温州市常住人口为790.1万人，为全省第一人口大市，比杭州、宁波分别多3.9万人和100.6万人。按常住人口计算，温州市城镇人口比重为60.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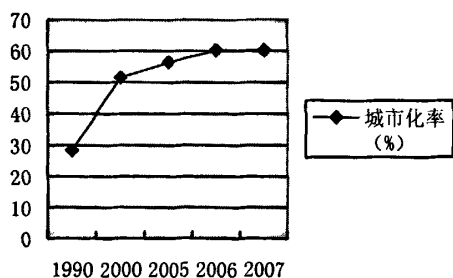


图 4.1 主要年份温州城市化变动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2007）

三是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是一种协调分工、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空间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功能，城市化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市场化，拉动了投资，刺激了消费，活跃了外资，刺激了民资，为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2006年，全市城市市区 GDP 为 778.5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42.4%，分别比 2000 年增长了 142% 和三个百分点；由于城市市区的“退二进三”，使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优化；城市化在提升城市经济功能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使城市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如表 4.1 所示，温州市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已经接近第二产业比重，且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2.1 个百分点。

表 4.1 温州市主要年份国民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比重 (%) 情况

年份	GDP(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第三产业
1978	13.2	42.2	35.8	31.1	22.0
1984	30.2	37.3	38.6	34.6	24.1
1990	77.9	27.4	44.7	38.2	27.9
1993	196.0	13.3	58.4	50.8	28.3
2000	822.0	6.6	57.5	50.8	35.9
2003	1212.5	4.7	57.2	51.8	38.1
2004	1388.9	4.7	56.7	51.4	38.6
2005	1596.4	4.1	54.3	49.8	41.6
2006	1837.5	3.5	54.7	49.9	41.8

资料来源：根据《温州统计年鉴 2007》第 59, 62 页

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学者对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体系（见表 4.2），2006 年温州市综合得分超过了 66 分，说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前半段。同时，参照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从温州居民当前的实际消费情况看，目前温州已经明显进入了汽车消费快速上升的时期，同时兼有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特点。虽然从人均 GDP 看，到 2006 年温州刚超过 3000 美元，但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列全国第三。综合各项指标计算，参照居民实际收入、消费水平，本人认为，温州的产业结构演变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而且也可以看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表 4.2 地区工业化划分标准及 2006 年温州的指标值

基本指标	前工业化阶段 I	工业化实现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 V
		工业化初期 II	工业化中期 III	工业化后期 IV	
人均 GDP(经济发展水平)(美元)	720-1440	1440-2880	2880-5760 (3060)	5760-10810	10810 以上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产业结构)	A>I	A>20%, A<I	A<20%, I>S	A<10%, I>S (3.5:54.8:41.7)	A<10%, I<S
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工业结构)	20%以下	20%-40%	40%-50%	50%-60%	60%以上 (72.5%)
人口城市化率(空间结构)	30%以下	30%-50%	50%-60% (57%)	60%-75%	75%以上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就业结构)	60%以上	45%-60%	30%-45%	10%-30% (16.1%)	10%以下

注:

1、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学者在进行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时,选择了人均 GDP、三次产业比重、制造业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这五项指标进行综合打分,并分别给予 36%、22%、22%、12%、8%的权重,最后计算结果,大于 0 小于 33 分位前工业化阶段,大于等于 33 小于 66 分为工业化中期阶段,大于等于 66 小于等于 99 分为工业化后期阶段,得 100 分为后工业化阶段。并且以该阶段得分的中间值为界,把各阶段划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

2、A、I、S 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

3、表中括号内数字为温州该指标的数值。

资料来源: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 年第 6 期

4.1 温州市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4.1.1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互动关系

温州工业化进程中的低城市化效应,反过来开始制约工业化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提高增长能力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因此,温州的工业化发展,就需要有城市化为其提供外部环境,通过强化城镇城市化,促进工业化

及其阶段转变的动力机制，促进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布局，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状况，增强经济增长能力。

4.1.2 以城市化促进农村现代化

推进城市化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工业化水平，改善环境，加快实现现代化，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温州人多地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较高，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力量大面广，只有通过城镇城市化，才能有效地解决农业人口有序地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集约化和农村现代化。

4.1.3 强化要素集聚

温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集群的发展（见表4.2）。根据温州块状经济的现状特点，加快温州的城市化发展，绝不是简单的人口集聚和规模扩大，也不是单纯的工农业量的增加，而是要以强化要素集聚为中心，通过加强要素向优势区位的集聚，强化城市现代化功能，培育区域中心城镇，优化温州城镇体系结构，积极消除城乡融合和要素交互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表4.3 温州市各主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基本情况（2006年）

产业名	主要分布	规模企业数	产值(亿元)	出口值(亿元)
电气	乐清、瓯海	712	477.37	66.41
鞋革	鹿城、永嘉、平阳	738	391.84	172.76
服装	鹿城、永嘉、平阳	297	176.43	32.28
通用设备	龙湾、永嘉	651	207.58	35.44
交通运输设备	瑞安、瓯海、乐清	348	129.57	35.68
塑料	平阳、苍南、龙湾	458	208.30	19.78
印刷	苍南	195	38015	1.47

资料来源：《温州概况2007》第19页

但由于自身发展的不足，加上周边城市的崛起，温州城市的辐射能力已经相对减弱。为此，不仅要加快港口、道路等硬环境的建设，更要争取政策、制度等软环境的优化；不仅要加强有形商品市场的建设，更要加强金融市场和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等无形要素市场建设；不仅要注意温州人居环境的改善，更要注意开放形象的树立；不仅要增强中心城市的节点功能，更要构筑配套的多

层次的区域城镇体系。要按照十七大精神，以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为主要目标，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加快消除不利于城镇城市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城市化进程，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进一步加快温州的富裕小康社会建设。

4.2 当前温州城市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4.2.1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走过了一条通过民营化、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不少体制性障碍的硬伤，城市化现状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增长速度不相适应，2000-200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1.5%，而城市化水平年均仅递增1.45%；

二是工业布局不合理，工业用地紧张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温州与杭州、宁波等城市相比，资源约束格外明显，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瓶颈制约，人均耕地全省最低，直接造成企业扩容的困难，抑制了投入。2000年温州市供地量占全省的比例为11%，2003年占全省降到2.5%。另外配置效率不够高，不少成长性中小型企业无法得到土地，同时供地率也一直难以得到提升。

三是产业层次低，传统产业技术更新缓慢，新型产业发展滞后。温州工业企业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但整体优势不突出，已形成的产业集群，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层次偏低，技术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不少产业和产品已陷入过度竞争、同质化竞争的低水平竞争格局；

四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三次产业结构仍然不合理。2002年第三产业占全市GDP比重仅为38%。温州市的城市化水平不足以满足农村工业企业对集聚规模效应的要求。从1990年开始至今，产业结构一直呈现“二、三、一”的特点（见图4.2），温州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演进理论，是一个向工业化中后期不断迈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稳步上升，但也可以看出，能量释放最充分、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是工业。而温州第三产业水平的低下正是与较低的城市化相对应的，因此当前温州市工业化进展放缓、三产难以壮大与城市化滞后互为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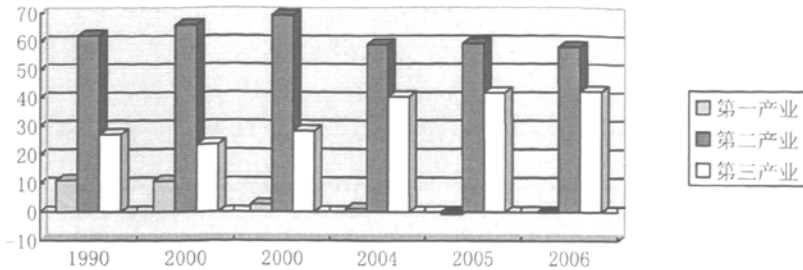


图 4.2 1990年-2006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2007）

4.2.2 城镇体系和中心城市功能不完善

到 2006 年末，中心城市聚集的城镇人口大约只占全市城镇人口的 19%。城市人口在 20 万—50 万的中等城市全市空缺。部分县域中心城市和 125 个小城镇都只具备镇级的人口规模。这种平面化的城镇体系由于缺乏中间层次，缺少了城市能量有效传导机制层，出现了中等城市的断层，体系的不完善，必将损害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同时，由于支撑体系的不足，进一步导致了中心城市功能弱小。而小城镇数量的庞大，实际上与中心城市功能的弱小是有因果关系的。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集群式、块状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扩充在支撑着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没有充分发挥，而乡镇企业则“遍地开花”，至 2006 年底，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70.2%。城镇总体的集聚效益较低，全市城镇体系的平面化特征明显，小城镇的分散化，使农村呈现“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景象。由于长期以来注重工业本身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发展，没有与城市化紧密衔接，城市规划与工业发展规划脱节，造成工业布局分散和生产力分布不尽合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心城市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相对下降，中心城市功能弱化。温州县（市）区域经济利益的实现，相当大的部分并不以中心城市为依托或支撑地，如果区域利益的实现途径不经过区域中心城市，温州中心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县（市）区域经济中可有可无的城市。当不与中心城市联系的开放经济比例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直接损害到中心城市功能的拓展。近年来部分有实力的企业频频“迁都”上海正是佐证。这种平面化的城市体系，结果是使温州的区域难以形成一个在经济链条上紧密结合的整体，严重削弱了温州作为沿海地区开放城市的竞争力。

4.2.3 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首先是港口建设问题。港口是基础性资源，是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支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温州港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宁波港和福州港之间，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建港条件，港口现代化是温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市委在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温州市“一港三城”的发展战略，已明确港口建设是温州市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任务。但目前从总体上看，温州市深水泊位数量和货物吞吐量只占全国沿海港口总量的1%；港口规模小，现代化水平低，功能单一；结构性矛盾突出，临港工业基本未起步；与港口衔接的公路、铁路不配套，集疏运条件差；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远洋航班空缺，近洋支线航班无法正常营运，只能处于喂给港地位，经济腹地内大量货物和箱量外流；深水港建设起步艰难，动作不大。温州港目前至少已经落后宁波港15—20年，已经严重不适应主枢纽港的地位，也影响了中心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城市化的集聚发展。

表 4.4 浙江省各港口吞吐量情况（单位：万吨）

港口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宁波港	11547	12852	15398	18543	22586	26881	30969
舟山港	3189	3281	3281	5722	7359	9052	11418
杭州港	2187	2337	2131	2828	4864	5094	5221
温州港	859	1314	1676	2338	2630	3102	3275
台州港	950	1024	1100	1457	2022	2067	2107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 2007》第 405 页。

其次是能源问题。能源紧缺已经开始制约温州市经济和城市发展。温州市近几年来对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设施投入不足，至今历史欠帐较严重，严重制约温州市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4.2.4 城市化区域发展不平衡

温州市从城镇发展密度、形态与发展阶段上可以把当前城市化区域分成三个不同发展进程的区域，即中心城市及周边高度城市化地区、两翼城镇连绵区、山区海岛点轴城镇发展区。由于忽视区域整体发展，导致出现区域发展严重差距。一是块状经济差距拉大。在瓯江、飞云江、鳌江流域及文成、泰顺山区形

成多个经济增量阶梯，并呈北高南低，差距进一步拉大。1992年，三区两市GDP占全市54.8%，财政总收入占全市61.3%。而2002年底，三区两市GDP占全市份额上升到71%，财政总收入占全市份额上升到80%。

二是发展趋势差异明显。经济增量大的三区两市发展势头强劲，城市化进度明显，而永嘉、洞头随着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的上马，拉动效益明显，发展潜力很大。而南翼四县交通欠发达，城镇规模小，发展速度与北翼的差距逐年拉大；三是贫富差距逐渐明显，欠发达地区脱贫步伐缓慢。温州市虽属沿海发达地区，但欠发达面广，人口多。尤其是山区海岛贫困人数多，城镇集聚效应差，城市化实现难度也很大。全市列入省百乡扶贫攻坚计划的有38个乡镇，到目前约有35万人年人均收入低于1800元。而城市年人均收入已达到26000元。

4.2.5 长三角经济因素的影响

从所处的地理区位看，温州地处中国无足轻重的“盲肠”位置，以至于国家对温州从未予以很大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按人均计算只有88元，远低于全省平均的240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依靠自身努力，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形成了全球闻名的温州模式。但如今，当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进一步崛起时，位于长三角边缘的温州便成为“两不沾”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这一边缘化的地理区位限制，当相邻的台州市也挤进长三角经济圈的时候，温州却一度被关在了大门之外。实际上，从经济发展历史上看，温州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心城市，自身就是浙南中心城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物流、资金流速度的加快，使得温州中心城市功能被周边城市尤其是上海等长三角城市分流。当前温州大量资金的外流以及县域经济中一部分功能或企业直接通过与上海联系获得市场、信息等经济资源，削弱了温州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从总体上看，上海为首的长三角经济因素对温州的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具有很强的弱化作用，特别是当上海本身作为城市还处于旺盛的集聚阶段，其扩散能力相对其集聚能力还较弱的时候。

4.2.6 城乡冲突

1、开发成本。城市的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是政府统一投资建设的，其服务范围是全市县域的，易形成一个政府出钱而区、县、镇、村多个发展主体受益的情况。但实际开发效果上，政府统征地因成本过高而缺乏吸引力，各区、

县、镇的留用地因为开发成本低、地价便宜，又能方便享用市政基础设施而吸引力大增，形成了吸引投资的所谓“盆地效应”，这不能不说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

2、城市化的冲击。城市的快速发展，使靠近城市的部分村镇迅速为城市所包围，急速发展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又往往忽视村镇现状和发展需要，使新旧设施系统衔接不上，标高不统一，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现象；甚至多处出现因新建城区破坏原基础设施造成水浸的问题，损失巨大。反之，许多城中村的存在又因其管理和政策上的独特性成为城市整体进步的障碍，更新发展非常困难。

3、农村的困境。乡村经济长期缺乏活力，与城市缺乏带动和扶持是有关的。农民收入提不高，农村购买力市场形不成都影响到城市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大量农村土地的预征和统征降低了对土地长期投入积极性，土地资源作为工业化初期重要的原始资本其运作受到严格限制，也不利于农村地区（包括部分区、镇）的财富创造和积累。

4、非开发者拥有土地。温州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各县市自己筹集资金（如水利工程），以地抵工程款的现象非常普遍，其后果如何呢，政府提供抵款的土地一般都是接近完成开发准备的熟地，而接受者不一定有开发的能力和愿望，常处于待价而沽的状况，使这些土地常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发，既影响了城市统一发展的步调，也打击了土地市场的信心，政府损失的是最好的用地和相应的发展机会。这似乎走进了一个怪圈：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创造的土地资源被非开发者占有，既不能开发利用又不能进入正常的流通市场，还造成城市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混乱。许多村镇正在为缺乏发展用地而苦恼，而许多后备用地又掌握在城市的债权人（而非真正的发展商）手中。那么在发展机会来临的时候，该用什么去留住这些机会，或者说应有什么资本去创造这些机会呢？在这些债权人低价进入城市的土地市场时，温州损失的不仅仅是某些用地的机会成本，而且还有整个市场的秩序、信誉和价值总量。

4.2.7 社会管理能力不强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收入差别悬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外来务工人员难以融入温州社会，由此产生的社会摩擦和冲突经常发生。同时由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区域性和行业性环境污染、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等带

来的利益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访以及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亟需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完整体系。但是这方面建设在温州还十分薄弱，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管理理念无论在领导干部还是群众中都还极为缺乏，领导干部的“全能政府”意识和“包揽天下”的心里还严重存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也十分薄弱。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尚未完全转变，政府社会管理方式比较僵化单一，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和发展要求。对明确和完善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实现两者的互联、互补和互动，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缺乏研究和引导，基层社会自我管理功能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未能很好发挥。

第 5 章 温州城市化进程的体制障碍

5.1 城乡二元体制

纵观我国 50 多年的城市化历程及其制度安排，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城乡二元模式。这种制度特征必然会引起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工农业两级对峙的二元发展格局。城市化制度安排的二元模式首先表现为城乡双重居民身份体制。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村和城镇人口人为分割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次，二元模式表现为城乡双重交换体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实行偏重城市和保护城市的政策，不仅从户籍制度上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在商品交换上还实行不平等的交换体制，即依据行政手段，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实现城乡的商品交换。有什么样的城市化制度安排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城市化过程，正是这种具有双重性的制度安排，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特征，时至今日，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仍然存在并严重影响着温州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两极分割的局面，也成为推进城镇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一是流入城市的资源原本在农村；二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跨过进城的门槛；三是政府财政支出更多投向城市，农村得到的利益明显减少。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村镇规划建设难以有效实施，低小散、脏乱差的面貌改变不明显；农业产业化步履艰难，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与农民年人均收入的比值进一步拉大（如表 5.1），城乡居民收入比 2006 年达到 2.88，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表 5.2），这种局面也阻碍了温州市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表 5.1 温州市主要年份城乡收入比情况

年份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城乡收入比
1981	477	270	1.77
1990	2007	912	2.20
2000	12051	4298	2.80
2006	21716	7543	2.88

表 5.2 温州市 2006 年城乡收入比与省内主要城市比较

地区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城乡收入比
全省	18265	7335	2.49
杭州	19027	8458	2.25
宁波	19673	8847	2.22
温州	21716	7543	2.88
绍兴	19178	8620	2.22
台州	19953	7368	2.71
嘉兴	17129	8952	1.91

注：城乡收入比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

资料来源：郑黎明. 温州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分析. 温州市统计局

5.2 土地政策与用地制度

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温州本身用地空间的狭小与城市建设的拓展矛盾日趋突出，土地问题已成为制约温州市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温州市的用地机制和政策也不适应当前人多地少、土地需求旺盛的现状。一是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调控力度不够，尤其是对生产性土地的调控，一味地追求用地规模的扩大，而不注重土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产业档次的提升。尤其是温州市大量低层次、高占地消耗的传统工业使得工业用地使用效率低下，温州市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年产值仅 28 个亿，而我国大多数同类城市的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的年产值都已超过 40 亿元；二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引发地方政府与农民间的矛盾。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城市化要征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如何补偿实际上涉及农村集体资产的价值评估和转让收益问题。目前，根据《土地管理法》，征用农村土地的补偿

标准是按该地块前三年农作物的产值进行计算的，按此办法，快速城市化地区不少农村的征地补偿标准远低于周边城镇土地的价值。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的潜在收益机会大，农民往往认为政府应该参照周边地区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征地补偿，为此，政府与农民在征地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利益矛盾。此外，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用地审批较严格，地方政府征用土地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依法完善用地手续，在此期间政府与农民间的关系更趋紧张，特别是实施土地市场秩序整治以来，由于征用土地所引发的矛盾更加明显。二是农村集体用地的流转制度难以引导土地集约利用和规范农村资产交易行为。温州社会资金充裕而且流动性强，农村集体用地的资产性质逐渐显现并不断加强，农民如果利用农村集体用地建设物业进行招商引资和出租，则农村集体用地（特别是建设用地）可成为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依托，因而形成了农村存在自建物业营利的强烈需求。但是，温州没有及时因这一发展趋势而建立一套引导农村集体用地有序建设和交易的制度安排，结果大量的农村违法住宅和厂房建设禁而不止，在广大的镇村地区和“城中村”形成了“城市不象城市，农村不象农村”的城乡面貌。二是土地使用政策没有创新，导致征地难问题日益严重。在城市化过程中，变相“经营”农村集体土地，以牺牲农村土地作为城市发展的代价，没有落实好农村征地政策，没有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没有解决好失土农民的后顾之忧，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致使温州市当前征地工作举步维艰；三是城郊结合部土地管理不善，导致土地利用率高。城郊结合部是城市近期发展的主要地段，温州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往往注重对城郊结合部实施规划控制，而忽视了对该地区用地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使用，致使城郊结合部内出现的大量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倒卖土地的现象屡禁不止，使之成为温州市当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盲点”，各种“城市病”高发的集中地区。政府缺乏对该区域问题的深入研究，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合理的引导，仅简单地进行控制和对违法行为的查处，难以遏制城郊结合部脏乱差现象的蔓延，社会群众反响强烈；四是农村城镇化中旧村改造用地政策未能落实，导致村镇规划建设难以实施，整治进度缓慢，乡镇面貌迟迟难以得到改善，农民的相对贫困和农村建设滞后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旧村改造的拆迁和土地政策，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市政府又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旧村改造工作的推进。

5.3 行政区划体制

不利于要素集聚和城镇体系结构的合理调整，制约了大都市、中心城镇的发展和城乡统筹规划建设。温州现有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都是以各自行政区划为界、各自为政发展的。现行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一是“一城多府”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尤为突出。由于管理体制、管辖范围的重叠交叉，增加了土地规划、管理的难度，同时也加大了城市规划与招商引资的成本；二是行政体制制约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迁进迁出，关系到地区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也影响到当地政府的政绩和经济利益。因此，当生产要素在流动时，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阻碍，从而导致中心城区产业集聚缓慢，劳动力就业不足；三是城市发展的外延拓展与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温州市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副中心城市及中心城镇的建设，都要求拓展建成区，使现有行政区划有迫切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的必要。而温州市的城镇体系规划建立在行政区域基础上，相应地在城镇布局上，各级政府都力求建立属于自己的经济中心，于是形成重复建设的局面，制约了中心城市的形成，龙港、鳌江就是典型的例子，城市职能趋同。地区之间恶性竞争。大量的重复建设，城市职能的趋同化，自然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两极分化的加深以及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理论上两地在职能上应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生产上，龙岗、鳌江的产业结构大同小异，经济上很少协作交流，都无法用传统的城市职能“优化组合”、生产力“合理配置”的理论解释清楚。实际上，温州小规模城镇数量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种基于行政区划的城镇规划形成的，不是按照经济区域发展对城市、人口集聚的要求，而是按行政区域人为对市场进行分割而形成的城镇体系；四是温州市至今保留的城中村制度，造成了村改居工作的滞后。建成区内大量城中村的存在，使村居比例失调，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服务功能的发挥，也影响了城市化的顺利开展。

5.4 人口政策

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目前仍在发挥作用，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正常流动。一是温州市农村人口约 620 万人，其中约 360 万非农业就业人口由于

户籍制度的限制，只能以“离土不离乡”的非城市化生活生产方式居住在农村，他们和他们所在的企业难以向城镇集聚，他们的子女由于户籍原因不能到城市学校就读，否则就要交纳高昂的借读费；二是在城市化的人口梯度转移中，山区人口的下山集聚是脱贫基础，但由于温州市没有长远统一的移民规划，移民机构、政策不完善，尤其是移民过程中的用地政策无法落实，使山区人口向周边城镇集聚难以有效实施；三是数百万外来员工不能获得温州户口，直接导致他们在迁移、招工、住房、生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障碍。我们常用三个“200万”来形容温州的流动人口：外市流入温州的人口200万人，温州流出人口也高达200万人，温州市内各县（区、市）之间流动人口还是高达200万人，这一状况在本世纪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他们的流动都是非户籍改革型的流动，具有不稳定性、不彻底性，政府又没有很好地搭建政策平台，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享受一般市民待遇。过于频繁的流动，形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隐患不小，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四是人口老龄化加快。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温州市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55.85万人，占总人口的7.39%。人口预测结果显示，21世纪上半叶温州市65岁及以上人数将呈现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2019年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首次超过10%（10.48%），到2028年、2035年时将分别超过14%（14.57%）与20%（20.02%），在2049年时则将超过30%（30.10%），届时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①。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和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的温州社会构成了极大挑战。

5.5 城乡规划的决策管理体制

城市规划的科学合理制定，是提高城市化水平、指导城市有序建设的基本依据。随着城市化加快推进，尤其是温州市确定建设现代化山水大都市发展目标，面临着加快发展的新态势，对城市规划的科学决策和有效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重大城市规划的确定缺乏必要的决策机构和程序。温州市目前是规划决策与实施合一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性，缺乏有效的科学决策与监督；二是城市规划是政府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一种手段，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建立社会公众参与规划制度，是提高规划公正

^① 郑锦春，吴志鹏. 温州人口结构与发展态势. 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性和减少政府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温州市城市规划对社会各界、市民的公开度不够，造成规划科学性、实施性不足；三是规划与规划实施的统一受到行政管辖的制约，存在着部分脱节现象。1999年市委、市政府已经明确大都市统一规划，由于行政分割，至今无法整体实施，难以纳入统一规划管理。如城市总体规划已将瓯北镇统一纳入，但二级政府分治管理，已经造成瓯江两岸的建设不协调；四是难以实施有效的城乡规划管理。规划管理机关职能复杂、层次较多，具体项目的管理操作占据了其主要管理力量，而运作经费和人员安排都存在一定困难，对广大乡村地区的建设管理有时就勉为其难；而区、镇一级政府无明确的职权可着力解决一些微观上的管理问题，且其人员及经费无固定来源，也产生“管不了”的现象。

5.6 财政体制

一是县（市、区）或乡镇级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即财权小于事权，造成城镇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尤其是乡镇一级。镇政府的财政只是县级财政的一个财务室。在财政预算内方面，镇政府的财政总额是按基数、人头拨付的，而没有实行实际意义上的分税制，在经济发达的如柳市、龙港等镇，所得到的财政额只是该镇域内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的10—20%。另外，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是镇财政支出的大头，约占县财政拨给的50%左右。在财政预算外方面，由于职权在上面，收费由县政府所属部门控制，镇政府只能得到很少的份额，许多明文规定要留镇里使用的预算收费也被部门截留。土地出让金和城镇建设配套费是城镇建设的专用经费，应该返回给镇用于城镇建设，但实际上，镇只能得到部分，且该专项经费有相当部分被用于弥补行政事业经费的支出缺额。由于镇政府行政事业经费不足，城镇建设专项经费被挪用，致使城镇建设项目欠帐很多，镇政府建设经费赤字很大，乡镇财政包袱很重；二是市区三个区缺乏财政支撑，建设积极性不高。市区区划调整后，新的财政体制中，土地出让金和城镇建设配套费统筹到市财政统一调配，不利于发挥各区、中心镇的建设积极性，使当地急需配套到位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资金。尤其是社区建设，市里有资金却没有力量和精力来实施，区里有力量却没有资金，极大地制约了市区配套服务功能的发挥，削弱了社区的基层组织作用。

运用税收与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

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目前看来，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有效的调解。究其原因，主要是温州市政府财政收入相对较低，制约了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不足。从财政收入来看，温州市 2002 年-2006 年之间财政收入占其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2%-13%，2007 年财政收入占其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6%，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45% 的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 25% 的水平，也低于杭州和宁波。除了总量不足之外，转移性收入在不同收入组的分配并不均衡，2006 年温州市城市居民 10% 最高收入户的转移性收入是 10% 最低收入户的 1.8 倍，可见转移性收入并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同时在分配能力的不足也表现为税收调节不力，这大大限制了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能力。一方面，政府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调节不力，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力度发挥得不够理想。2006 年，温州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为 6.7 亿元，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 5.9%。另一方面，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调解也不够。2006 年，在温州市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的费用为 6.81 亿元，用于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为 2.14 亿元，两者合计为 8.95 亿元，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 0.5%。

第6章 温州城市化建设的体制创新

6.1 完善城乡建设管理体制

6.1.1 完善规划决策，理顺规划管理体制

1、发挥规划龙头作用，建立科学的规划决策管理体制。加速推进城镇城市化进程，必须要重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从体制、机制、决策、审批、执行、监督等环节入手，形成规划管理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权限划分比较合理、管理方式比较科学、管理运作机制比较规范、并有相应规划管理人才支撑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建立并完善城市规划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实施规划决策与执行分离，强化各级政府对城市规划管理的监督职能，改进监督方式，形成全市统一领导、县（市、区）政府负责、部门密切配合、专家决策咨询、公众参与监督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机制。要尽快建立市一级城乡规划委员会，其中专家、学者在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一定要超过公务员，实施规划统一决策；进一步建立公众参与规划制度。重大规划决策前必须公开规划，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建立专家规划咨询制度，成立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或专家人才库，从各层次征询专家意见；要建立完备的规划审批制度。在规划审批过程中，坚持集体研究决定，个人依法办理的原则，避免个人专断、不按规划审批或超规划审批，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2、打破“诸侯”规划，因地制宜地推进区域协调。过去人们对城乡协调内涵并不理解，习惯于从地方自给自足的角度解决问题，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局限，本质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所谓的诸侯经济的反映。尽管从经济的角度看，各地区或者城乡之间没有关税，并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各个地区之间本不存在贸易障碍，但是，事实上由于行政区划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无形中会形成一些贸易的、生产的堡垒，从而对城乡经济发展形成一个重要的体制上的障碍，结果导致无序发展、重复建设、盲目竞争等种种问题，因此必须打破狭隘的行政地域观念，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反映在规划上就是要超越行政界限，打破诸侯规划，把规划纳入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轨道。

3、完善规划内容体系。以前以城市分区规划或详细规划覆盖乡村、代替村镇规划的做法在实施过程中产生较多矛盾，因此，为把规划与实施管理结合起

来，必须明确在保留村、镇建制的地区必须独立编制村镇规划，以适应其实施管理的独立性；村镇规划的内容应作调整：一是期限缩短，不超过 10 年；二是在土地用途划分上改变单纯的使用性质分类，结合土地管理政策和综合利用的要求作出安排，以利于环境保护和开发控制；三是简化规划内容，不求全而求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四是突出解决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衔接问题。

结合行政体制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顺应规划管理的客观要求，在此提出规划决策管理整合体制建构设想（见图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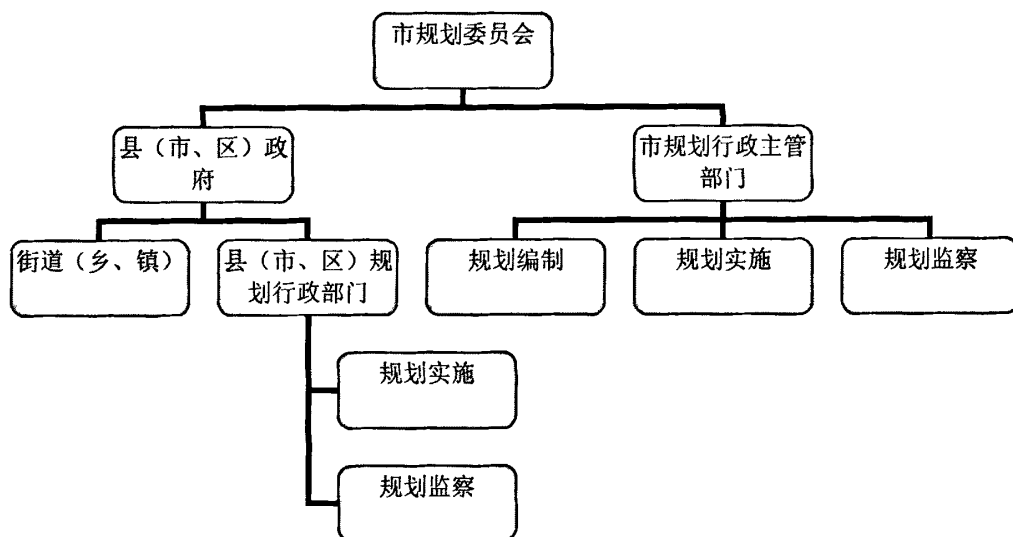


图 6.1 规划决策管理体制建构示意图

6.1.2 完善城乡管理体制，促进城乡统筹

一是完善“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赋予县（市、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建立全市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总的基调，就是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取向，坚持管理重心下移，弱化“条”的直接管理，强化“块”的综合功能，着眼于县（市、区）经济向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赋予县（市、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使之按照准二级市的模式运行。与此同时，要着重于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辐射功能的增强，以及由此引起的公共服务功能的强化。实践表明，只有贯彻重心下移的原则，建立健全协同推进城镇城市化的工作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好市与区县两个积极性，有力地推动城镇城市化进程；二是完善城乡之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对农民集体土地被租用后用于非农建

设开发的，其首次出让后增值部分的收益，应当返还一部分给原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兴办企业或将其还原于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对已离农进镇居住和就业的人口来说，还可将其转让农村土地承包权所得的有偿收入给其城镇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帐户之中，从而实现土地保险功能的转移；建立与土地市场密切相关的社区土地股份公司，由村级合作组织向土地股份公司入股，农民可按其持有的股份参与收益分配；要借鉴深圳经验，“城中村”的土地收益要全部用于旧村改造；三是消除一切针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障碍，允许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另一方面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消除郊区农村房地产流转的制度障碍，从而既可以方便城市居民到郊区置业，促进人口的交互流动，又可以增进农民利益，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四是建立城乡之间的生态资源补偿机制，可通过财政引导、加征环保税、补贴转移等手段来构建城乡之间的生态资源补偿机制，对农村生态与资源因城市建设或规划控制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市政府应从市中心各区上缴的利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建立农村生态资源补偿基金。

6.1.3 建立高效、合理、动态的城市管理体制

目前温州市城市管理虽然成立了行政执法局，但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分散管理和条块分割、部门职能交叉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卫生、社会治安问题仍相当突出，“整治一回潮一再整治一再回潮”的怪圈仍然没有走出。为此要在统一规划指导下，建立统分结合、批管分离，分级管理的“二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市、区、街道）”的管理体制。要按照“职能下移”管理原则，科学有序、协调高效的要求，明确市、区、街道三级管理职责，加强综合管理，克服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的弊端。各管理部门要找准定位，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城市管理的“主力军”作用。在坚持集中统一的前提下，理顺条块关系，实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一方面，要强化属地管理功能；另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建设和管理，把部分城市管理的权、责、利下放给街道办事处，完成城市基层管理制度。同时要建立“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机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相应的措施，增进市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广泛吸引市民参与城市管理。从而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网络，彻底消除城市管理的“盲区”和“死角”。

6.2 探索多元化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

6.2.1 政府投入和市场补偿相结合

加大政府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城市公共投资的职能，进一步完善财政对城市设施的投融资机制，社会公益性项目建设按政府公共预算的要求安排和管理，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经营性项目采取核拨资本金、实行财政贴息等多种形式配置资金。动员民间资金参与城市设施建设，积极创造社会资金投资城市设施建设的政策环境，采取股份合作制、公用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打破行业壁垒和部门、地区与所有制的界限，加快民间资金推进城市化的步伐。

6.2.2 “以城建城”的筹资策略

规范城市土地批租，城市政府要垄断土地使用权出让一级市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辟稳定的收入来源；规范出让方式，全面推行公开招标出让和拍卖出让为主来批租城市土地；建立和完善城市土地出让金用途分解机制，确保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并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促进投资资金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形成“投放——增值回收——再投放”的良性循环，推行BOT（建设——经营——转让）、TOT（转让——经营——转让）、ABS（资产收益抵押）投资方式和政府特许经营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扩大增量。

6.2.3 资本市场和国外、市外两个“外资”

加大直接融资的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建设项目的直接融资方式，积极争取利用公司上市方式筹措资金，同时选择工期相对较短、未来收益可靠的项目，通过发行债券募集建设资金。依靠温州市投资环境日臻完善的条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多方式吸引外商外资投资温州市城市基础设施。根据大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进入高潮的情况，多渠道充分向上接触，力争更多的国家、省的建设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温州市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加大力度吸引外地资金投入温州市城市基本设施建设。

6.3 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6.3.1 改革政府行政体制，理顺事权关系

按照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要求，对培育的中等城市、小城市赋予相应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科学、合理地设置政府机构，不断提高对城市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法制管理的水平。按照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要求，扩大和协调中心城市对其发展区域及腹地的管理作用。按照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小城市与周边乡镇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调机制，发挥小城市对周边的带动作用。对温州城市体系规划中的城市化镇，把它作为温州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增长点，重点扶持，加快发展，提高其集聚和辐射能力，赋予城市管理所必需的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和政府职能，通过委托和授权，赋予必要的行政执法处罚权。

6.3.2 改革现行财政体制

对重点培育的中等城市和择优加强的中心城镇，应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强化预算约束，以集中必要财力从事城镇建设，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从经济区域来合理布局和合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使其成为促进温州城市经济圈包括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效参与国内外竞争的主要经济增长点。要建立和完善重点镇财政体制，具备条件的镇，经批准可设立镇金库。对试点镇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选择部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作为县（市、区）、镇共享收入。城镇建设维护费、教育费附加、城建配套费等预算内外收入大部份留给镇；国有土地出让金按不低于60%的比例返回给镇政府；其他预算外收入根据镇县二级管理的需要确定分成比例。

6.3.3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要转变到加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弱化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构建“统一指挥、综合管理、条包块管”的城市管理框架。坚持依法治城，注重法规建设，严格依法照章办事，加强规范化管理。适应城市化发展要求，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城市日常管理的轨道。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来抓，坚持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一起抓，使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互相推动，共

同提高。

6.3.4 适时、科学调整行政区划

比较中外先进城市城市化进程，我国沿海地区已进入以扩散为主体的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都市密集带等城市化空间形态。要根据“一港三城”的城市发展战略和近期“向东、跨江、面海、扇形”的发展方向，扩大中心城区规模，构筑大都市框架，实现温州从瓯江时代向东海时代跨越，从滨江城市向滨海城市转变。要在温州市、县（市、区）编制数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行政分割、资源分散配置的格局，根据温州市大都市规划建设的要求，按照多设区、少设县的原则，大手笔、大思路调整温州市行政区划，尤其要充分考虑中心城市的科学合理配置和核心带动作用的发挥。目前温州中心城区与乐清市、瑞安市、永嘉县的南部地区和洞头的发展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要考虑中心城市的发展将主要向这两市两县扩展，有利于扩大中心城市规模和辐射带动能力，有利于瓯江两岸的统一规划建设；要改变鳌江流域的行政管理体制，整合鳌江流域资源，使之形成新的中心城市，加快鳌江流域城市发展步伐，促进南翼经济的快速发展；要紧密结合温州“一核三带四区”的产业布局，构造出一个既有序发展又具有活力的城市密集带，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要促进山区的生态建设和旅游业发展，西部山区尽管在经济上与东部相差较大，但也保留了多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色，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促进山区生态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议将雁荡山、楠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进行整合、合并，强力打造更大的旅游品牌。同时要加快进行城关镇改街道和城中村改居的步伐，理顺行政体制，以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

6.3.5 发挥中心城市主导与带动作用

中心城市，是区域的经济、文化的高地，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圈的整体发展，具有主导区域的作用。第一，温州大都市要在体制上消除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扩大城市空间布局，推进中心城市圈的建设。温州市的中心城市建设必须推开行政区划的大门，不断提高城市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要完善中心城市圈内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供水、电信信息网络、人居环境、基础教育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心城市圈的城镇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第二要运用市场手段，密切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各方面的联系，促进多

边的互惠互利。通过中心城市的拉动力和辐射力，“以点带面”，形成区域性中心城市经济圈。一方面，中心城市的经济体制、运行制度、竞争机制、生产消费体制等要为城市周边地区提供经济体制的示范和指导、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心城市是所在城市圈的经济支撑，在经济结构上，城市圈的周边地区不能与中心城市形成趋同甚至相互排斥，政府要加强协调引导作用，促使城市圈内经济协调发展。

6.4 创新农村土地利用制度

6.4.1 制订统一的集体土地基准地价体系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问题的焦点在于土地问题，目前改革土地征用和建立流转制度所涉及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合理确定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从而为补偿标准和流转价格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成有其特殊性，是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划分给农民集体的，这些土地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可以用于房地产经营，“城中村”集体用地转国有用地也需补缴土地出让金。此外，城镇周边地区的农村集体土地价值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巨额投入，如果任由征地补偿价格攀升至城镇土地的市场价格，将对城市化的推进构成巨大的阻力，对地区发展和村民自身长远利益也是不利的。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与城镇国有土地相比，在产权上并不完全，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暂时还不应“同地、同价、同权”。改革土地征用和建立流转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改革的切入点应该是尽快相对统一征地补偿和集体土地流转价格的标准，尽量避免政府、农民和用地企业在征地和土地交易过程中过多地进行讨价还价并引发矛盾磨擦。在操作上，可由地级市国土部门进行统一评估，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划分片区，综合考虑周边城镇土地价格、农作物产值和基础设施投入等多项因素，制订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体系，经省级部门确认后，以此作为征地补偿和土地流转价格的标准，并每隔一段时间（如3年）作一次调整。不论是公益性项目征地还是经营性项目（两者的区别其实是城市规划的结果）的征地补偿，都应采用同一的基准地价体系，但可在征地补偿的方法上，采取预留村级发展用地、补偿款和预留用地入股等补充性方法，让农村集体经济在新增用地项目上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或股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6.4.2 引导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和集聚

按目前国家允许征地的范围，温州城区等快速城市化地区再过5—6年就可能无地可征，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补充城市用地的一条重要路径。这迫切需要通过建立政策规范，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防止农村土地和资金的粗放使用，杜绝农村违法建设的再发生。目前，广东省已经出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行办法。在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引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集聚，目前广东省在中心镇政策中提出了通过土地置换等办法促进镇村土地的集约利用，也应该加快制订相关的实施办法。各地在建设工商业集聚区时，应该考虑尽量将周边农村零散的建设用地通过置换等方式集聚在一起，既减少征地工作，又有利于统筹平衡各级政府和各村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关的用地审批工作应加快制订专门的政策规范。农村自行利用集体用地进行违法建设和交易有着强烈的利益动机，政府如果不能及时作出引导，社会资源的浪费将会相当严重。

6.4.3 加快完善村委会“直选”制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与村民委员会“直选”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自2001年开始，全面实行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大大激发了村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加强了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推动了农村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但是，现有“直选”制度对候选人的学历、资历等基本没有限制性规定，而当选后的村长却掌管村集体资产管理的人权，给予了不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通过“直选”进入村委会“寻租”的机会，而且“直选”任期仅三年一届，容易导致村委会的短期行为。快速城市化本来就会带来整个区域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的重大调整，与此同时推行“直选”制度，给社会稳定和农村集体资产的长期收益增加了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建议采取措施完善“直选”制度：一是加快推行村务公开，所公布的集体资产经营情况要进一步细化，以增加村民对村委会班子工作绩效的了解。二是对村委会参选资格要加以适当限制。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营造较为稳定的环境，促使农村集体资产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收益。

6.5 改革户籍制度

未来区域经济的竞争主要是中心城市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的竞争，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能充分吸引人才的城市，才是最有希望的城市。因此，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吸引各类人才是温州今后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措施。就全国来讲，启动城乡统一户籍制，打破城乡户籍壁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如大连市，出台了《大连市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办法》、《大连市关于私人投资、购买商品房产户口迁入暂行办法》，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划分，按居民实际居住地和从事的职业，划分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并登记居民常住户口。同时，取消“农转非”户口计划指标和“农转非”审批。城市区划内的农村人口及政策性需要“农转城”的，由各县（市）区政府按照市政府确定的当年人口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当地经济和社会承载能力，确定“农转城”的范围和数量，报市政府批准后施行；重庆市从2003年9月1日起，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打破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实行城乡户口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所有户口统称“重庆市居民户口”。

温州是较早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地区之一，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以促进温州城市化的进程。建议由公安部门牵头，会同政研、体改、民政等部门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重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打破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统一全市（包括所有县市区）户籍政策，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划分，按居民实际居住地和从事的职业划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并统一登记为“居民常住户口”；二是进一步放宽人口进城的限制，在全市范围内，包括温州市区可凭房屋所有权证明，就地登记户口，直系亲属可以随迁随登；三是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方便群众；四是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在政策上的区别对待，逐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待遇、两个等级。人口集聚是一种资源，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

6.6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它对城市化进程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今后温州市应加强社会保障工作，使人口在拆除城乡藩篱的基础上，由市场来配置，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使城市化的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一是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覆盖面的重点是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此外还包括在城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和临时工。对个体工商业者参加养老保险，鉴于其职业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如缴费基数可以按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缴费比例可以低于正规就业部门，缴费的方式可以更加灵活多样等。同时要把最低保障体系向农村延伸，力争在全省率先实现最低保障城镇城市化；二是加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1999年1月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各类企业和职工依法缴纳养老保险义务及拒绝缴费所要承担的法律法律责任。据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加大基金征缴、稽核的工作力度，并依法处罚有能力缴费但逃避责任的单位，对过去欠缴的养老保险费也要限期补缴。温州市社保基金的征缴可以推广乐清市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银税联网、税保挂钩”的办法，力求实现非公企业全员参保。但鉴于当前在征缴社保基金过程中遇到的企业负担过重，逃避社保基金征缴的现实，我们认为个人与企业负担的比例可以由企业与职工个人自行商定，社保部门予以承认，以解决部分职工要参加而企业予以阻挠的情况。同时社会保障是政府重要的公共职能之一，政府要逐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并积极开辟社保基金来源的渠道，如争取发行社保彩票、把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为社保基金等；三是把失地的城中村农民的社会保障提到突出的地位上。当前失地的城中村的农民已经成为温州市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加强这一部分人口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温州市城市化过程中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要以农民“失土不失业、失地不失利”为原则，制订合理的拆迁安置政策，加强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策性的引导，变农民被动参与城市化为主动参与。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温州城市化虽然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突出。国内外的研究者通过对城市化的历史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对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还关系到温州城市化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加快温州城市化的进程，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仅需要探索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应该结合温州实际，探索影响温州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制度因素。

7.1 本文的主要结论

本文立足于探讨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深入分析温州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和障碍，指出体制因素是影响温州城市化进程的深层原因，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创新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1、探讨了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指出了制度安排与城市化之间是一种双向互促的关系。制度安排对城市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制度的创新。

2、对温州城市化体制作了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指出其是影响我国城市化的深层原因，并对如何影响城市化的进程作了深入的剖析。笔者认为，温州长期以来“无为而治”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城市化推进体制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温州市场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体制已经成为当今温州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3、从微观层次上探讨了几种主要的体制(城市发展管理政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建设投融资制度以及城乡管理制度)对温州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就如何对现有体制进行创新提出了具体建议。

7.2 本文的不足之处

制度经济学博大精深，涉及到经济史、法律、社会心理学、国家、利益集

团等诸多领域，为认识 and 解决转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只是笔者在对相关理论粗浅认识的基础上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阐明了体制因子对促进城市化聚散功能的效力。所有这些都只是书房里的结论而已，仅仅是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小部分问题进行的理论上的剖析，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依赖于改革者的实践和艺术。其中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虽然笔者力图在吸收前人精彩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理论水平的限制，仍然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

其一，文章框架较大，涉及的内容较多，加之笔者的理论水平有限，对于论题的研究还比较肤浅，有些论述还不够深入。

其二，本文的研究多是些理论性的探讨，只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了论证和阐述，而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因此研究的主要内容显得有些单薄，这必然影响了文章的论证力度。

其三，非正式制度是本文没有提及到的，而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对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影响是深刻且长远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具有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基础。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中，非正式制度已经发生也将会继续发生的隐性影响。如计划经济观念、对土地的依念、对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的严重依赖等，都或多或少地阻碍着体制创新的进程。

其四，从体制障碍及创新来探究制度安排，仍然显得局促一些。制度安排包罗万象，而体制只是其中一个片面，因此可能难以起管中窥豹之效，需要进一步从多方面分析城市化制度。

以上这些不足之处，有待于本人在将来的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的完善。

致谢

弹指一挥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了。回首这三年的经历，我经历了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时刻。生活上，遇到了我美丽的妻子，拥有了我可爱的儿子，也正是幸福家庭的关怀和支持，才使我始终坚持在学业上匍匐前行，在筚路蓝缕中编制我的梦想。学业上，这三年，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不仅学习了知识，而且历练了意志品质，还收获了真挚的师生之情、同学之谊。

我首先我深深地感到能遇到王霞教授这样的导师是我一生的荣幸。论文酝酿、构想的过程非常漫长，一直觉得难以下笔，从爱人怀胎开始一直到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论文的空白让我愈加惶恐。而在论文主题和框架提出来以后，王老师的肯定让我信心百倍，她的建议意见又让我清晰地看到努力的方向，论文的写作突然顺利了起来，思如泉涌。初稿形成后，老师又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其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让我受益匪浅。在此，特别感谢王老师在百忙之中拨冗对我进行细心的指导，使我能够不可思议地捧出这么多学业和思想的结晶。

同时我借此总结之际，感谢所有同济的授课老师、MPA 中心与温州教学点各位老师，尽管难以一一列举，但一份份交到我手上的精神财富和热情帮助将永铭我心；感谢我的同事们，在我求学期间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最后更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没有他们的鞭策，我想我没有机会来写这篇致谢。

一篇论文，倾注了我的智慧和心血，不管水平如何，都是对我研究生生活最好的注释和总结，是对自己三年时光的交待，曾经的努力过，付出过、懒惰过，在这里都是“yesterday once more”！

由于理论、写作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局限，论文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望阅读此文的诸公谅解并不吝指正。

陈俊屹

2008年6月于华盖山麓

参考文献

- [1]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300 页
- [2] 王放. 我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 [3] 张五常. 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4]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经济研究, 2003 年
- [5] 苗建军. 城市发展路径——中心城市发展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6] 魏敏, 李国平. 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梯度转移. 经济地理, 2005 年
- [7] [日]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 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01 年
- [8] 方军.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城市问题, 1999 年第 4 期
- [9] [美]科斯·诺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上海: 三联书店, 1991
- [10] 吴力子. 制度创新与我国的城市化. 南京社会科学, 2002 年第 10 期陈忠. 城市制度: 城市发展的核心构架. 城市问题, 2003 年第 4 期
- [11] 黄新华. 制度创新的经济学理论. 理论学刊, 2004 年第 1 期
- [12] 汪和建主编. 现代经济社会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 第 442 页
- [13] 吕玉印.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年
- [14] 陈秀山, 张可云. 区域经济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 [15] 刘传江. 我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16] 孙久文. 区域经济规划.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 [17] 周毅. 城市化释义. 嘉兴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 [18] 杨宜勇等. 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 北京: 经济出版社, 2000 年
- [19] 陆益龙. 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 [20] 黄晋太. 二元工业化与城市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年
- [21] 汪和建主编. 现代经济社会学.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22] 廖喆. 都市圈中心城市与成员城市排斥效应的博弈分析.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3
- [23] 顾慧君、王文平. 产业及群与社会网络的协同演化——以温州产业机群为例. 经济问题探索, 2007 年第 4 期
- [24] 姚锋平. 温州模式的发展及困境分析.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1 期
- [25] 叶裕民. 我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 [26] 刘芸等. 我国城镇化进程与制度革新. 国土经济, 2002 年第 8 期
- [27] 熊丽萍. 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创新. 小城镇建设, 2003 年第 1 期。
- [28] 范阳东等. 我国城市化障碍的深层次分析. 克山师专学报, 2002 年第 2 期
- [29] 李培林, 景天魁主编, 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 [30] 邹农俭. 制度创新: 引导城市化走上有序之路. 学海, 1998 年第 4 期
- [31] 卓高柱编著. 求索温州.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参考文献

- [32] 北京社科院. 城市人口规模与容量的理论思考. 北京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1 期
- [33] 吴坚. 农村人口城市化与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江海学刊, 2002 年 6 月
- [34] 刘群. 国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三种模式. 价格月刊, 2002 年第 6 期
- [35] 易霞仔等. 开拓城市建设融资新渠道. 淮南工业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3 期
- [36] 杨天宇. 经济制度批判.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 [37] 黄少安. 我国农村城市化需要制度创新. 发展, 2001 年第 12 期
- [38] 陆玉麟, 董平. 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功能定位. 现代经济探讨, 2007 年第 1 期
- [39] 张立建等. 我国城市化滞后根源新论. 城市问题, 2003 年第 5 期
- [40] 陆升军. 我国城市化模式的制度成因.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3 年第 4 期
- [41] 方立明, 项洁, 奚从清. 移民社会与经济发展. 温州论坛, 2007 年第 5 期
- [42] 刘传江. 我国城市化发展: 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2 年第 3 期
- [43] 汤海孺. 制度创新: 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城市规划汇刊, 2000 年第 5 期
- [44] 缪军. 我国城市化的约束. 城市规划, 2003 年第 7 期
- [45] 郑宇民. 看温州模式: 如何实现新跨越. 浙江经济, 2007 年第 7 期
- [46] 陈憬, 杨开忠. 我国城市发展政策及其环境影响. 城市问题, 2002 年第 5 期
- [47] 彭春华. 我国城市化中的农村制度创新要求. 岭南学刊, 2002 年第 1 期
- [48] 王琼.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 2003 年第 2 期
- [49] 刘传江. 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创新. 理论与改革, 2001 年第 5 期
- [50] 陈东其. 论二元结构转换. 福建论坛, 2002 年第 5 期
- [51] 费尚军.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伦理支持.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4 期
- [52] 许庆明.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作用. 浙江学刊, 1999 年第 5 期
- [53] 史晋川, 金祥荣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54] 李效梅. 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分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1 期
- [55] 刘玉辉. 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机制. 学习与探索, 2002 年第 4 期
- [56] 杨鹏程等. 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障碍及其创新. 重庆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6 期
- [57] 林嘉. 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58] Arie Graafland and Deborah Hauptmann, *Cities In Transition*, Rotterdam, 010 Publisher, 2001
- [59] Armstrong, H.W. and Taylor, *Regional economics and polic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UK, 2000
- [60] Mark Gottdiener and Ray Hutchison,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The McGraw-Hill, 2000
- [61] W.G.Flanagen, *Contemporary Urban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62] Chan, K.W,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td, 1994
- [63] Chan, K.W,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Research Paper No.175. Centre for Urban and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9

- [64] Chan, K.W and Xu X.Q,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ost -1949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04), 1985.
- [65] Champion.T, *The complexity of urban system: Contrasts and similariti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vited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IUSSP's XXIIIrd Gener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1997
- [66] Eaton,J. And Eckstein, Z, *Cities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Japa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 1997
- [67] Han, S.S. and Wong, S.T,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form and pre-reform policies on urban growth in the 1980s*, Urban Geography, 15-16, 1994.
- [68] Thomas, L, *City-size distribution and the size of urban system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7, 1985
- [69] Henderson, *Medium size cit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 1997
- [70] Gong Hongmian, *Spatial patter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cities, 1980-1989*, Urban Geography, 16(3), 1995.
- [71] Goldstein.S , *Urbanization in China , 1982-1987:Effects of migration and reclassific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 No.4, 1990
- [72] Geyer, H.S. and Kontuly, TM,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cept of differential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7 (2), 1993
- [73] Ma, Laurence J.C, *Anti-urban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s, 8, 1976

个人简历

个人简历:

1996. 9-2000. 6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国际文化系就读
2000. 8-2003. 2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培训中心工作
2003. 3-2005. 8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办公室
2005. 9-至今 温州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温州城市化发展体制性障碍及创新研究

作者：[陈俊屹](#)
 学位授予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相似文献(7条)

1. 学位论文 [周静](#) 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的体制性障碍及对策研究 2008

农村职业教育跨地区统筹是以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在构建和谐社会、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背景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面向流动的受教育者对职教资源及相关行政资源实施跨地区配置的制度。

从实践来看,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实施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政府的直接组织到政策调控的不同发展阶段。现阶段的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具体表现为农村和城市、西部和东部之间的跨地区合作办学,既有在政府部门行政指令下的合作办学,也有学校之间的自主合作。

本文选择了跨地区统筹过程中的二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即资金统筹和就业统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在资金方面,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无力支付全部的跨地区学习费用、而两地政府因行政体制性障碍又都小愿为跨地区接受职业教育的这部分学生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这就造成了跨地区职教统筹的资金短缺问题。在就业问题上,论文提出了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就业障碍,既有传统城市化过程中政策性障碍的残余影响,又有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的新壁垒。因此,既要继续解决好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传统政策环境,又要着眼于城乡统筹解决好城乡之间双向的动态流动和共赢机制,从而赢得城乡共同的理性发展。

在我国目前城乡和地区之间管理体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资金问题的解决需要输出和输入地两地方政府打破管理体制障碍,共同构建统筹协调的保障机制。同时,学校要通过校企合作,半工半读的形式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实习报酬,通过这些措施,实现政府补贴、半工半读、学生自筹以及社会公益力量的捐赠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学生跨地区接受职业教育的资金问题。解决农村职教跨地区统筹的就业问题同样需要地方政府打破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从统筹地区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出发,消除跨地区招生以及就业中体制性障碍。政府也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支持企业与学校合作,为校企合作、半工半读创造条件,更好扶助农村地区发展职教,鼓励劳动人口返乡创业。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2. 学位论文 [陈俊玲](#)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证分析 2004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和相关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本研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基本建立,以城市化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翔实的调查与研究,并力求将发展的路径上升到政策的高度,冀望能有助于我国产业良性互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融共长的目标。

本论文共分为9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点明了研究的背景、目的。

第二章: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发展战略。回顾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我国与西方的发展历程,对传统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传统发展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持续发展模式正日益受到各国的青睐。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可持续发展思想更具指导意义,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可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历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更好地推进城市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与指标体系,提出了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原则,并且指出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的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高度统一。

第三章: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第四章: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普遍规律与发展趋向。界定了城市、城镇的不同涵义,简略回顾了城市的产生过程、发展阶段及其动力机制,概括了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几种经济规律,重点回顾与展望了世界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和趋势。

第五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颇多,如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总体趋好、人口增长趋缓等等。但是,城市化发展也面临许多不利挑战: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产业结构尚不合理,不利的区位制约,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城市区域经济布局很不合理等。

第六章: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导原则与实施规划。从宏观上提出了加快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发展目标,重点设计了城镇的发展规划:城镇空间规划和城镇人口规划,包括建制规划、规模结构规划、职能分工规划、空间布局规划。建立了城镇建设的各项指标:用地、园林绿化、能源、道路交通、给排水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等指标体系。

第七章: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与路径选择。首先,提出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在追求水资源和土地等稀缺资源的高效利用、改善城市环境和提高人口素质上加大力度。其次,根据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了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支持系统。

第八章:新世纪初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论文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展开:要通过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视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增强城镇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要建立规模合理、等级有序的城镇结构体系;要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要树立现代城市形象,营造新型城市社区文化环境。

第九章:结束语。

本研究有如下主要创新之处:1、论文选题具现实性、前瞻性与综合性。在我国,对于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开展过不少的论证,出台过一些政策性文件,但比较全面地把城市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思想结合起来,本论文尚属首次尝试。

2、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城市化的论述和西方城市化发展主要学派的主流思想,并把二者紧紧结合起来,用以解释、分析我国种种城市化现象、指导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3、较为完整地建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诚然,直到今天,科学、合理的城市化体系仍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但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

4、较为系统、全面地从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对加快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探讨,强调了城市文化及城市人精神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5、针对我国现阶段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体制性障碍,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立足创新,消除体制约束,增强制度供给,尝试从户籍、土地、投融资、社会保障、居民就业等不同方面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持系统。

6、提出在市场经济新体制背景下,提高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的、首要的战略选择的观点。

7、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领域较多。本论文以系统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西方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不同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3. 学位论文 [刘亚菁](#)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转制社区管理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2007

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是中國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整个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的改革与制度变迁。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然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一个正在发生体制转型的“农村”却不自觉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去,反而出现了由原来村镇城市化后转制而成的过渡型社区——转制社区。由于转制社区从农村转制而来,体制性障碍未能最终破除,城市与农村之间还有许多不断的血脉联系。这种形式与内容不符的双重性,使得转制社区建设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阻碍于城市化,旁落于“新农村”。

大量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提示的事实是,转制社区是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转制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越发凸显。它关乎民生国计,关系城市化发展进程,更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发展。全面推进转制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于民是共享发展成果、于党是巩固执政基础,于国是促进和谐安康,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全局,做好转制社区建设更值得人们广泛关注。

深圳市1992年首先启动了特区内外三个区的农村城市化工作,历时一年将68个村委会4万多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时隔12年后,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2218个村委会27万村民2004年底完成了身份转变,至此,深圳率先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两次城市化改造中引发的启示和反思,更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深圳市的城市化过程为例,通过对农村城市化中转制社区管理的实证考察,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第一,农村城市化中转制社区的矛盾积累主要体现在人、财(经济)、地(屋)三方面;第二,左右城市化的症结在于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改革;第三,解决加快转制社区后续城市化的路径选

择。

4. 学位论文 郑艳华 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2007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乃至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吉林省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本文以吉林省为例,在论文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查阅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研究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国内外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探讨。概述了国内外研究动态,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工作。

第二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对国内外地区成功转移模式进行研究,得出经验借鉴。

第三部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总结回顾吉林省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变化,分析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

第四部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分析。分析指出了新时期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农业领域就业压力逐步加大、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的障碍等主要问题。

第五部分:促进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和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思路,并应采取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继续坚持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提高劳务输出质量,探索城乡统筹就业新路子,扫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5. 学位论文 赵一放 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2004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我国人口大省—河南省实际,在调查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查阅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研究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结构分为六章:

第一章:引言。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概述了国内外研究动态,明确了本文研究的思路和分析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准备工作。

第二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际经验与理论分析。分析介绍了劳动力转移与出口导向战略和区位优势:农村非农化与劳动力转移。

第三章: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征和趋势。总结回顾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的历史变化,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并对未来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基本判断。

第四章: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指出了新时期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农业领域就业压力逐步加大、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的障碍等主要问题。

第五章:加快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对策建议。研究提出了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思路,并应采取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继续坚持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提高劳务输出质量,探索城乡统筹就业新路子,扫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第六章:结束语

6. 期刊论文 徐晓秋,李勇, XU Xiao-qi, LI Yong 浅析城市发展走向成熟期的前景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07, 19(2)

从影响城市发展走向成熟期的关键因素出发,用情景分析法对中国城市化发展到成熟期的基准情景、协调发展情景、风险情景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到成熟期的3个阶段,从而对中国的城市化提出了选择走效益型道路、打破体制性障碍、关注城市群发展和注意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对策和建议,同时对杭州市城市发展何时达到成熟期进行了判断。

7. 学位论文 杨渝 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研究 2007

本文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为主旨,从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入手,运用史论结合、中西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方法论述和谐社会问题。全面深入地阐述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经济结构优化这一河北省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期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优化河北省经济结构奠定较完备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和主要创新如下:

1. 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学分析。明晰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内涵,分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达到小康社会的基本经济指标、必须妥善协调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和必须正确处理各种经济矛盾;梳理了和谐社会的经济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对和谐社会与经济结构相关性展开分析,加深对和谐社会结构内涵的认识以及经济结构效应的机理分析;认为社会和谐是经济结构优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2. 国外经济结构调整经验借鉴。首先就经济转轨与社会和谐对中国、俄罗斯、中东欧进行比较研究,分别从低度和谐中的停滞与经济转轨,到以效率为目标的经济转轨与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经济转轨的目标进行系统分析;其次,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与启示。

3. 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分析。首先分析了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描述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模式,论证了构建“和谐河北”的基础、思路及目标。分别从产业结构、城乡经济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入手,阐述了和谐社会标准中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的构成体系。

4.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首先梳理了河北省产业结构演进脉络;其次,分析了产业结构与资源特点、投资结构、传统产业、人力资源以及政府行为导向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重点。调整方向是:建立与需求结构相协调的产业结构、建立与生产要素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建立内部和谐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优化企业组织经济、进一步优化外部环境。

5.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剖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及根源;分析了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现状、低水平城市化的具体表现和原因;认为河北省要把调整城乡经济结构的重点放在城乡空间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产业结构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等方面。而政策工具选择应主要放在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调整城乡财税分配政策,加快耕地流转,提高农民素质,推进农村人口向外转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思路,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加快改善农村公共设施条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6.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对河北省区域经济结构现状进行分析,从国家层面的环渤海和京津冀都市圈,到河北省“一线两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分析了产业增长点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指出河北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推动环渤海区域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全面实施“一线两厢”区域发展布局;以港口建设和临港产业发展为重点,壮大沿海经济带;着力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坚持把城市化摆在活跃全局的战略位置,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投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等。

7.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河北省财政税收结构调整研究。分析了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行为,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要尽快地实现从经济建设主体向公共服务主体的转变;分析了社会保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提出构建适应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析了税收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财税政策取向。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50271.aspx

授权使用:温州大学图书馆(wzdxstg), 授权号: aed03e64-832d-4bd5-ab75-9d9e010caf40, 下载时间: 2010年6月

